



## 中评周刊 | 第 98 . 99 期合刊目录

### 专题 | 电影《流浪地球》是科幻还是梦

1. 木日: 以奇观娱乐大众 P. 3
2. 胡涵: 我才不想跟着集体主义的地球一起流浪 P. 6
3. 《人民日报》董阳: 科幻影视新跨越 | 谈小说《流浪地球》电影改编 P. 9
4. 左丘失明: 流浪地球, 不及格 P. 11
5. 李冰: “拯救地球”梦一场 P. 14
6. 许鹏: 《流浪地球》里的科学常识错误实在太多了 P. 21
7. 陈威威: 《流浪地球》高票房是计划经济回潮的一个样本 P. 27

### 专题 | 国进民退: 民企已退悬崖边?

1. 郑风田: 蒙牛吃上国企垄断盛宴不值得欢呼 P. 33
2. 高敏: 值得警惕的“国进民退” P. 35
3. 陈青蓝: 东星航空倒在国进民退大潮中 P. 38
4. 李昌庚: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P. 40

### 观点文章

1. 李照兴: 《流浪地球》从中美贸易战看国产科幻片 背后讯息应如何解读? P. 48
2. 弗马: 对《流浪地球》的哲学批判: 哲学能为中国科幻的发展做些什么? P. 53

### 随笔散记

1. 陶东风: 拒绝有技术的野蛮人 | 开学伊始谈什么是大学精神 P. 61
2. 狄马: 高尔基说谎 P. 68

## 读书

[李炜光：中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缓慢转身](#) P. 71

## 审美苑

[周南焱：专家谈中国科幻电影：编剧、导演心有余而力不足](#) P. 78

## 预告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82

[订阅](#) | [往期下载](#) P. 84

## 木曰：以奇观娱乐大众

[ 本文首发于 2019-3-6 中评周刊，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我带着好奇心去看电影《流浪地球》。好奇有两处，一是原著中浪漫而略带傻气的幻想——毁灭降临时带着地球出发；二是电影在舆论中的两极化评价。当片尾卡司出现，我才得以解脱。这样一部标准的“商业娱乐片”观感平庸，公式化的剧情套路缺乏咀嚼回味的空间，就电影的艺术性讲不值得多做讨论。



科幻影片《黑客帝国》海报

电影的背景设定源自小说，太阳膨胀，即将吞没地球。人类不得已建设行星推进器，推动地球踏上 2500 年的旅程。化作宇宙中一朵漂浮着的蓝色泡沫，这样疯狂的拯救计划是难得的创意。视觉奇观是科幻片的标配，本片也不例外。尤其放在国产电影史中，《流浪地球》的特效进步颇多。宏伟的行星推动器，冰雪蹂躏下的大都市，巨大木星吸走地球的大气层——华丽是有了。

《流浪地球》的困窘在于纵然有工业技术帮衬，难掩内容上的空洞虚无。自以为是的青年叛逆出走，受到感化回归主流价值观。地球受木星引力影响板块变化，行星推进器熄灭，意外接踵而至，在

大场面特效的帮助下持续刺激观众的感官。危机下主角面临牺牲与抉择，以此营造流泪感动的戏剧效果。但是全片不断重复这样刻意煽情的桥段，人物情感粗糙，个性贫弱。导演似乎觉得有了快速剪辑，有了特效炫技，有了“父爱如山”的亲情，就能唬住观众，抹掉剧本漏洞与细节缺失。混乱的画面与吵嚷的配乐一直在掠夺观众的情感，这样的电影不需要也不会带给观众思考，它一直在“攻击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大脑、你的常识和人类希望被娱乐的欲望”。



影片《流浪地球》中食品中出现“陈年蚯蚓干”

媒体标榜《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元年，在我看来它尽管披着科幻的外衣，英雄拯救世界才是其核心趣味。电影与原著小说相比，且不提科学性，就细节与世界观的塑造上着实无法令我满足。譬如，全世界仅剩 35 亿人，躲进地下城，那样的世界会有什么变化，社会结构如何运转？电影里只有少量肤浅信息：废除货币、蚯蚓饼干、奇怪的运载货车等等。但是班级语文课上做作的课堂教育，居委会发饺子，地下城几个街景中无处不在的红袖章，似曾相识，仿佛末日没有发生。小说中刘慈欣花费不少笔墨铺呈末日下的绝望（未必合理）——人们普遍对太阳的恐惧，宗教艺术哲学消失，家庭伦理崩坏，生育控制，逃生排队按年龄小者为先，阴谋谣言导致民众叛乱等等。种种细节烘托出末日下的冷峻与虚无，此时希望显得弥足珍贵。电影抛弃深度细节构思，科幻精神已然殆尽。仅用灾难特效和亲情伦理来体现人类奋斗，亦非高明。

科幻电影的美好在于利用有限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展开无穷的想象。它是谎言，不能预知未来。但又类似思想实验，在无限可能的叙述中展现、反思人的存在。《流浪地球》在科幻世界观的建立上自是粗陋，而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观影过后，中国人以不同于美国的方式拯救地球之后呢？电影的意义除了感官娱乐之外，还有什么？能否带来新的生命体验？刺激结束了，茫然无所获。

不必否认，娱乐或者消遣乃是人正常的生物性需求。《流浪地球》止步于此，以视觉奇观来娱乐大众，并且获得票房成功。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部平庸的电影带来诸多言论争议与攻击。主流媒体赞美它的集体主义，它的“中国特色”。《流浪地球》也许没有《战狼 2》那么露骨粗鄙，但在挑逗底层民

粹，输出意识形态上似乎更加巧妙。

也不必否认，人们渴望不同的声音，渴望表现他们各自欲望或意义的电影，对《流浪地球》的种种质疑声便是证明。假如社会承认个体的价值，尊重个体，电影一类的文化市场自会多姿多彩。但在这个思想审查的专制国度，电影乃至大众文化，仅仅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政府或党派的宣传教育工具，二是权力认可范围下的娱乐消遣，这无疑是对人的侮辱。

我怀疑在一个自由、正常的文化市场中，平庸如《流浪地球》能激起几多浪花？ ❏

[【返回目录】](#)

## 胡涵：我才不想跟着集体主义的地球一起流浪

[胡涵 新京报记者。本文首发于 2019-02-09 作者个人主页]



本文作者胡涵

### 1

国产电影评论，一般而言都会沦为知识精英的理性主义与人民群众爱爽片的荷尔蒙之间的战争。最后一泡污。

作为一个喜欢自我加戏的专业观众，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被电影里的烂梗感动流泪，擦完眼泪立刻想起自己的精英做派，还得赶紧为上一刻的眼泪感到羞耻和惭愧。

以下是我完成上述动作后，对《流浪地球》的理中客总结：

从电影艺术角度看，《流浪地球》最多勉强合格。事实上，刻薄来说，整部电影唯一出色的地方，就是用相对不错的特效和成片，展现了一个高难度的科幻设定。当然，考虑到国产电影工业实现这一设定的难度，就足以为本片再加上一个本国感情分。

除此以外，这部电影从镜头语言、摄影技巧、思想深度到主角演技等，几乎无一合格。

但从现场观感来看，这部电影特效合格、剧情紧凑、情绪饱满，并且，的确吸收了国产电影屡屡得手的套路：摸清普通观众的泪腺所在，然后强行抚摸甚至是猥亵。

对于情感缺乏释放渠道的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在电影院里对着中国面孔为祖孙情、父子情、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旧日温存梦流泪，是一件再难得不过的事了。

这很低级，但很有效。没办法，我们多数人还没学会拥有更高级的情感。



## 2

喷子们可能会隐约觉得，上面这三段其实也不太像是说好话。

猜对了。我每每被一部烂片弄哭，都会再度怀疑人生。到底我是为了欣赏电影，还是为了找一个机会来宣泄情感？

事实上，中国电影在撩拨观众情感上走得太远，才造成了今天电影舆论场的对立。前面有前任三的莫名火爆，后面有战狼系列，无一不是以强刺激手法去撩拨观众的某一部分情绪。

而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观众，的确没有什么独立的审美能力，相反，他们倒是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能力。

这就导致一个后果：在这里，出现了一重影片评价上的分歧：精英影评人对电影质量的评论，会被很多人理解为对自我情感的攻击和非议。

犯人家内心小情绪者，虽远必诛。

## 3

这可能是潜藏在国产电影导演心中的一重成功学。下猛药刺激别人的泪腺，然后，他们会变成你的小战狼。

有个很尊敬的前辈在朋友圈里义愤填膺，声称宁愿把电影票钱拿去喂狗，也不应该去支持太空版战狼。

然而，这部电影在民族主义上远比我想象的要克制。尽管有若隐若现的政治倾向，把黑色幽默变

成了红色幽默，但说实话，远没有达到战狼的恶心水准。

但更值得讨论的，是这部电影真实撩拨了此前很多人没有触碰到的地方：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美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集体目标，并赋予所有个体和行为以神圣和狂热。在这样一个为目标而存在的集体之中，个人的牺牲奉献变成了一种献祭式的表演：献祭和表演，都是催人泪下的。

整部电影的情感基调，都建立在集体主义美学之上。吴孟达扮演的爷爷，为了地球而放弃救孩子，哥哥为了地球赌上了妹妹、父亲为了地球可以牺牲掉全人类文明的备份和胚胎库、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地球，紧密团结在了年仅十几岁的小政委周围。

在这样的情感基调下，是不可能写出动人的个体情感的，因此，吴孟达演技再好，也演不出一个让人心疼的爷爷，吴京的眼泪再飞，也还是“一颗小白杨”式的家国两难全抒情。

#### 4

集体主义是一个深埋在中国几代人道德情中的幽灵。事实证明，导演押宝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次成功的赌博。我们接受的教育从来都是时刻准备为一个伟大理想献身。

但这套价值观到今天仍能感动这么多人，却是我未曾预料到的。或许，现实世界里越卑微，越希望存在某个能够超越现有秩序的理想目标。集体主义的幽灵，伴随着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而再度滋生，并在大刘的作品和流浪地球之中，被成功唤醒。

刘慈欣的作品始终有一种理科生式的自以为是。所谓大格局和大集体，本质上是对当下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缺乏体察和认同。因此，动辄就是一半人类的灭亡、数十代人上百代人的牺牲奉献，要么就是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将不正义行为合法化，如入住地下城要抽签等等。

也正因为此，在人物设定和情感细节上，刘慈欣往往只能求助于宏大的集体主义。很可惜，流浪地球并没有弥补刘慈欣作品在人文关怀上的缺失，相反，还借势布满了集体主义的情绪地雷。

无论从培养观众审美，还是电影艺术价值的角度看，这都是一种缺憾。当然，如果你非要以中国特色来解释这部分问题，那讨论也到此结束了。

因为落后野蛮，从来都不是什么特色。 🍷

[【返回目录】](#)

## 《人民日报》董阳：科幻影视新跨越 | 谈小说《流浪地球》电影改编

[ 本文首发于 2019 年 0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副刊 ]

流行文化最能看出社会的心态和国家的气象，《流浪地球》展现出来的强大工业制作能力、有待贯通精进但不容小觑的综合实力，令人充满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电影《流浪地球》里，“日月换新天”是实实在在故事情节。

太阳即将发生氦闪而爆炸，人类给地球安装上千个巨型发动机，计划用 100 年时间，将地球推离太阳系，搬家至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系。

这个故事设定如此大胆，在 114 年的中国电影史上，还没有哪部作品敢于正面直攻这样庞大的命题。近代以前，限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对于“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终极问题，人类只能以神话、预言等方式面对，进入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在载人航天技术实现“一小步”跨越之后，人们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想象地球和人类命运。

尽管如此，作为现代人的神话，科幻电影要在银幕上呈现“流浪地球”这样的恢弘想象，仍然是有门槛的：一是要具备强大电影工业制作能力，二是要具备为人类命运担忧“舍我其谁”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国视角和硬科幻视听语言讲述人类命运故事的《流浪地球》，至少在中国观众看来，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体验是前所未有的。

科幻片作为一种常见电影类型，此前中国电影人不是没尝试过。近些年来给人留下印象的就有《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未来警察》等。但这些作品基本都是软科幻：其科学设定比较浅显，重在趣味性；科幻元素往往仅限于人或未知生物的“超能力”，并不指向人类命运的必然性。还有一些类科幻或者玄幻、神话魔幻题材电影，存在缺乏科学依据等问题。可以说，中国科幻电影还没有“很硬的”先例，《流浪地球》因此在上映之前并不被看好。

《流浪地球》制作团队并没有取巧回避恢弘宇宙场景的直接呈现，而是正面直攻人类“开天辟地”的现代神话。随时崩解的冻原，巨大、复杂又冰冷的地球推进器，厚重的隔离服，巨型的空间站，无论全景还是细节，都有足够的视觉说服力，全片两个多小时，特效场面比比皆是，几乎看不到令人出戏的塑料质感道具和不符合重力规则的运动效果。这对一部科幻片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一旦穿帮，苦心经营的未来感和临场感瞬间破功，影像叙事的基础就瓦解了。

刘慈欣说，好的科幻片拍得像历史片。我的理解是，科幻片要有站在未来看现在的恢弘历史感。在这方面，制作团队下的功夫观众是能够感知的，冰封的城市地标建筑，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温馨提示，卡式电视游戏机，毛笔书写的大红福字，这些精心选择的细节都与未来场景构成了有意味的冲突，使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实现沉浸感和临场感。物境营造这个科幻电影最基础部分，是《流浪地球》最硬气

的所在。

观众对电影《流浪地球》的关注，显然跟刘慈欣以及他所引发的科幻热有关。相比于《三体》的妇孺皆知，中篇《流浪地球》是其早期作品。正如刘慈欣本人所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个创意蓝本。但其设定足够结实，给电影叙事留下发挥的空间。当简单抽象的文字退隐为“后台程序”，转化为故事架构、人物关系、恢弘场景时，科幻的冲击力充分释放出来。

电影《流浪地球》故事在原著基础上做了这样几个改动和延展：把故事里极为简单的人物设置理出关系，赋予形象和性格特征，以父子分别、祖孙相依的人物关系构架整个故事，赋予亲情的温度；把百十年后的科幻场景与今天的城市等具体现实世界缝合在一起，强化观众的情感代入和情感认同；强化中国视角，呈现不同国家人民共同面对人类灾难的场景，营造了人类命运一体感；影片最后，增加宇航员刘培强驾驶空间站“点火”土星的情节，把整个故事推向戏剧和情感的高点。电影在原著基础上进行自然而合理的生发，实现了新的创造。

观看《流浪地球》，有一种被强大视觉推着走的感觉，视觉呈现有足够的说服力，也会让人被紧张的命运感所牵引，被中国人勇敢担当画面所感动，看完久久不能平复。

从流行文化最能看出社会的心态和国家的气象，《流浪地球》展现出来的强大工业制作能力、有待贯通精进但不容小觑的综合实力，都令人充满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影片尚存一些有待完善提升之处，但对中国观众而言，观看《流浪地球》远比看一部“完美无瑕”的外国炫酷大片更有意义。 🍷

[【返回目录】](#)

## 左丘失明：流浪地球，不及格

[ 本文首发于 2019-02-05 豆瓣 ]

流浪地球是一部不及格的电影。对这部不及格电影的普遍吹捧，那些看了提前点映纷纷较好的写手和大 V，只能让我怀疑他们的人品与审美。

### 一、科学设定不及格

作为一部科幻片，一部被吹得很厉害的科幻片，流浪地球在科学设定上完全没有能过及格线。

全片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利用木星弹弓效应时，发动机受木星引力影响停止工作。这是对整个地球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界的无情藐视。如果连木星引力将会引起的各种结果都没有计算，没有考虑，还流浪个毛。对已知的问题没有预案，这是不可接受的。出现危机，只能是因为意外。

在热核聚变已经轻松搞定的设定之下，甚至已经可以随便挖石头搞热核聚变，开卡车居然是非常了不得的技能，自动驾驶辅助驾驶都没有，这没法接受。

在发动机的附近没有建设设备品备件库，非得千里迢迢用卡车运输，没法接受。

理应组织严密的地下城，随便找黑市弄个身份牌就能出去。这个设定糊弄外国观众或许还行，在中国，坐个高铁都要刷身份证，在线联网人脸识别。中国观众完全没法接受。

人工智能居然可以点火烧掉，没有联网没有数据备份，烧掉摄像头就可以干掉人工智能，诸如此类设定完全没法接受。

冲击波能够用 1000 马赫的速度推开地球，这个地球还能保持基本结构，没法接受。

人推人使劲去抵住一个东西，这是七十年代武侠片内力传输的设定吧？用在科幻片真的可以吗？……

诸如此类科学设定上的问题实在太多，我没法一一记录。这非常影响观影效果。看到一个不靠谱的设定，我就会想，这 TM 是为什么？然后我说服自己：算了，为了剧情需要。接下来是另一个不靠谱的设定。然后我又一次地想，这 TM 是为什么？

我知道有很多刘慈欣的粉丝会说，你不能吹毛求疵。好吧，我说个或许能让大刘粉高兴一点儿的言论：流浪地球里的科学设定，差不多赶上斯科特的《普罗米修斯》了，能够达到《太空旅客》的六成水准。开心不？

### 二、剧本不及格

如果说流浪地球的科学设定能赶上《普罗米修斯》，那么剧本则保持了国产烂片的一贯水准。人物

没有特点，台词绝不打磨，行动莫名其妙，剧情缺乏铺垫，笑点生硬可怜。

流浪地球中每一个人都是木偶，为了完成导演交待任务而设置的木偶。他们没有思想没有个性，面目模糊行为缺乏动机。

主人公偷跑到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是为了躲避爸爸回家……然后还带着妹妹……然后还没有准备……然后还不停地说这是天才……剧组是不是对天才有什么误会？

吴孟达这个外公是个纯粹功能性的角色。别看电影里他似乎很爱外孙和孙女，但是他并没有情感。或者说剧本里他没有表达情感的机会。在电影里，他是一个慈爱的外公，但是，他不是那个具体的慈爱的外公。他和小学生作文里胡编乱造的所有慈爱的爷爷一样慈爱，唯独没有自己真实的慈爱。

妹妹在整个电影里完全是个无意义的人。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哥哥救。妹妹存在的价值，跟《独立日》里那条狗差不多。

比妹妹更惨的是救援队，一千人的存在更无意义。他们连被救的功能都不具备。他们的功能，就是跟着剧情混，然后在剧情需要的时候丢一个人去死，或者去重伤。到底是死还是重伤完全看导演心情。

对剧本存在的问题就不更多展开讨论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剧本，去研究它到底有哪些窟窿，意义何在？

### 三、导演与表演不及格

流浪地球的节奏非常成问题，无论是台词还是镜头语言，总是不在点儿上。同样一个段子，高手能说得妙趣横生，水平差的说出来就是那么僵硬，那么不对劲。

比如影片开头展示地下城生态的一个镜头，那些群众演员在镜头中出现得太刻意。导演恨不得招呼大家：快来看呀，地下城是这个样子的。合格的做法，应该是让这些信息出现在背景之中，让观众去发现去感受。然而导演没有这样的信心。他对观众没信心，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整部电影里，主要角色一口京片子。而且是不怎么地道的京片子。油滑有余，幽默全无。

电影里所有的包袱统统不好笑。那个北京市交通委的段子，大概出现了 5、6 次。实在是肉麻当有趣。

吴京在空间站与俄罗斯同行的一段对话，感觉是两个初学表演的学生在尬戏。而这一段违反操作规程强行尬戏，也只是为了在电影的最后放进一瓶酒……唉，真是不划算。还不如让吴京对 AI 拳打脚踢一番，暴力破坏来得简单呢。

李——这种程序“高手”人设的角色。刚出现时惶恐不安，感觉是个 PTSD 患者；到了分配任务一节时，小人得志，油腔滑调，又成了一个躁狂症兼患者。偏偏电影还在正面塑造这个角色。导演和演员的无能可见一斑。

所有演员的表演都不及格。我就不一一点评了。

### 四、价值观不及格

流浪地球和刘慈欣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价值观不及格。

进入地下城是要抽签的。那些没抽中的人怎么办？按照设定，太阳出问题要在 100 年后，那些没有中签的人本可以活到自然死亡，结果因为你们打算流浪，让人家提前进入无法生存的环境。电影对此根本不置一词，完全不打算讨论。因为在刘慈欣和剧组的心目中，牺牲一部分人（几十亿人而已，西安以东而已），这不值得讨论，对吧？

吴京因为自己是宇航员，所以儿子和儿子的监护人就不用抽签直接进入地下城。然而影片交待：“所有进入地下城的人都要通过抽签”。这是 TM 赤裸裸的腐败和特权吧？然而电影对此仍然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刘慈欣和剧组的心目中，这么有能力有地位的人，家人得到一点特权，理所当然，不值得讨论，对吧？

老婆和岳父只能有一个人进入地下城，老婆生病快死了，所以就放弃治疗，好让岳父直接作为监护人进入地下城。吴京对自己的决定没有怀疑。岳父对自己剥夺女儿的生命活下来没有心理障碍。在刘慈欣和剧组的心目中，一个快死的人和一個还能活几十年的人，哪个的生命值得保留，完全不会有选择障碍，是吧？

整部电影里，普罗大众完全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只有在灾难来临时奔跑哭号。除了被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因为在刘慈欣和剧组的心目中，普罗大众听安排就好，对吧？

总之，流浪地球是一部严重不及格的电影。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史诗级的巨作？洗洗睡吧。

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如果没有那么多看了点映捧臭脚的五星四星，我或许还能给这部电影两颗星。现在我只会给它一星。因为恶心。 🤢

[【返回目录】](#)

## 李冰：“拯救地球”梦一场

[李冰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学术部专员。本文为 2019-3-6 中评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

名为《流浪地球》的电影于中国农历大年初一（2月5日）开始在大陆上映，这部号称“大投资、大制作、代表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曙光”的科幻电影一经上映，不但票房一路高歌，甚至还被定义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代表。

《流浪地球》的时间背景设置在半个世纪之后的 2057 年。其时，太阳即将膨胀而吞噬地球，迫于形势，全世界的工程师制定了一项计划，利用巨型推进器将地球送到一个新的太阳系，但当地球经过木星时，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引发了拯救人类免于灭亡的终极搏斗。

与其它行业相同，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电影虽然有过“八部样板戏”撑天下的文革时期，但事实证明，靠垄断维持的任何行业，包括电影行业，最后什么也撑不住。所以，还要改革、向先进学习，与所有后发国家的路径一样，一切都从模仿开始。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业，确实取得了较快发展，其中就包括 80 年代前后涌现出的第五代导演群体和他们的作品，在国际电影界和国际电影市场收获了荣誉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89 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开始全面收紧且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电影业自然包括在内，虽然每年都有新作品，但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电影。

与“没有好电影”感觉相反，中国的电影投资却越来越大，只是因为“有钱了”，而且“有钱了”之后，就要“任性”。由于存在审查和“禁区”，中国电影所能涉及的题材可以说十分逼仄，电影产品既要符合“意识形态”部门的要求，又要尽可能的被大众接受，保证和扩大票房实现高收益，这样就形成了难以完成的人物。于是，“手撕鬼子”、“宫廷争斗”，就成了投资安全的选择，一时间粗制滥造充斥了中国的所有荧幕。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受国家有关部门力推，同样由演员吴京主演的《战狼》系列，虽然票房获得了丰收，但有关部门希望通过作品灌输给大众指定的“价值观念”目的，却遭遇了滑铁卢，差评如潮。有鉴于此，用更新的形式使大众更容易接受，被有关方面全力支持的《流浪地球》自然难逃被赋予这种探索的“责任”。

回到《流浪地球》电影本身，既然是模仿，就要把戏做足，同时更要把“价值观特色”渗入其中。于是，孤胆英雄、父子情深、大无畏、牺牲、叛逆和成长、意志力和决断，甚至黑暗面的地下黑帮等等这些“好莱坞”元素，几乎都被移植到了这部电影之中。从技术角度看，电影在 3D 技术运用、场景、音效方面确实有所突破和提高。也正因为如此，电影票房才能一路走高，并使观众产生了部分的共鸣。



2004 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灾难片《后天》逼真的特效震撼了观众



2009 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灾难片《2012》海报



2019年中国官方力挺的春节贺岁档科幻片《流浪地球》，  
画面模仿《2012》、《后天》等好莱坞科幻影片的灰蓝色调

中国是始终坚持“特色”的国家，并对这种“特色”极度的迷恋和固守。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到40年“经济改革”，所有的引进全部被“工具化”处理，而对其中包含的“普遍价值”进行过滤、甚至反动。在《流浪地球》电影中，这种对“普遍价值”的反动，虽然力求达到“润物细无声”式的隐藏，但并非无迹可寻。

首先，故事中危机出现的2057年，世界由联合政府管理，“拯救地球”的任务，理应是全球共同决定的一致行为。可是，影片中展现的，却仅仅是中国和俄罗斯及部分亚洲国家在努力，并最终拯救了地球。这样的安排是否暗示着，全球其它的所有国家都已走向衰败，即使在这种关乎人类生存的事件中也无力行动？而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蓬勃发展且有能力担当责任，甚至太空科技曾最早领先世界的俄罗斯，在影片中也只能被安排为配角。

中国太急于成为世界中心和领导世界了。

历史的看，当最早的“天朝上国”，从自欺欺人的虚荣梦幻中，突然被“船坚炮利”击碎后，“卧薪尝胆”然后的再次争霸，就成为了皇权体制一切行动的基因和终极目标。于是，不论是“韬光养晦”，还是“弯道超车”，都只是为“走向世界‘权力’中心”的铺垫，由此更加体现了这个体制对“权力”的终极崇拜，以及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的认知误区。即使在现实中这种疯狂的行为不断遭遇“不利”而难以实现，也要在想象中潇洒梦一把。

其次，既然要坚持“特色”价值，就要有所体现。于是，就有了可以牺牲地球一半人生命的“联合政府”的“决定”、取消货币施行“信用点”兑换、“居委会”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处可见的制服统一的公务人员在维持“秩序”。

“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旅游卫视”全部存在，同时播报着一致的声音，即使在人类毁灭的时

刻，也“指引”着人类命运的道路。影片中的这些设定，明确表达着这样的意图，“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才是世界避免灭亡的选择。

但是，由于“特色”观念与“普遍价值”的难以“融合”，《流浪地球》中，承载着特定价值体现的人物形象以及内容合理性方面，就难以避免的出现了断裂。例如，按照具有“博爱、‘集体主义’英雄典范”来塑造的“父亲”形象（吴京饰演），因为身份的特殊（空间站人员）而拥有“特权”，搞到了本应公平抽签进入避难“地下城”的名额。这与影片极力塑造的“集体主义”英雄典范形象，产生了根本性的分裂。

以跨文化研究而著名的心理学家蔡安迪斯认为，中国“垂直型集体主义”真正所提倡的一定是“大公无私和舍己救人”，如此，影片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初衷的反面。

再如，这个“父亲”果断放弃了生病妻子的生命，换取了另一个进入“地下城”的名额，这同样违背了“人物形象”设计的初衷。按照“集体主义”定义，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主人公唯一合理的选择，只能是牺牲自己让妻子活下去（尽管可能时间不长）。另外，当看到自己儿子身处险境之后，马上违反“联合政府”命令，擅自动用集体资产“航空器”救援儿子，行为更是违背了“集体主义”所要求的原则。

到此，电影中这个人物的塑造，彻底的被撕裂，在逻辑上彻底的失败了。而造成这种必然失败的根源，就是构成塑造人物底色的“集体主义”，根本上就是一个谎言和乌托邦幻想。蔡安迪斯的研究显示，“集体主义”刻意塑造的“典型”，由于极难发现“现实版本”，在现实中深究，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个“道德败坏”故事不断被发现的过程。

“特色价值观”的先入为主，还导致了影片在人与世界、人与人、段落情节合理连贯方面，出现的必然背离和矛盾，即使从满足“类型片”标准的要求方面，也不能说达到了真正的自治。克里斯蒂安黑尔曼在其所著《世界科幻电影史》中明确表示，对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中的情节必须能做出现实的解释，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尽管具有随意性，但重要的是内容框架必须有相应的科学依据，作品中自然会涉及伪科学，但不起决定左右，要区别于恐怖电影和幻想电影。

从电影历史看，任何电影都包含着价值取向，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过选择、提倡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确是人们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因为这种选择对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走向，甚至能产生不能忽视的影响。如何看待电影，以及不同的电影理论，同样体现了不同观念的选择。

与西方发达国家阵营相对，代表着“无产阶级阵营”被誉为伟大导师的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着更进一步的表述。而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顾问兼策展人周健蔚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片子经过了层层审查和删减才做到“领导喜欢、大众接受”。

影片上映后的2月12号，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中国观众看《流浪地球》

比看外国大片更有意义”的文章，文章表示，电影展现了“强大电影工业制作能力，为人类命运担忧‘舍我其谁’的底气。”14号，人民日报钟声再次发表文章，“《流浪地球》折射源自现实的未来感”，文章认为，这部电影“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文章强调“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到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再到2011年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成功、2017年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进入太空，中国不断向宇宙深处探索。不久前，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被世界称为“了不起的科技壮举。”新华社也报导称，这部电影是“中国科幻片的里程碑作品”、“迈出了追赶荷里活顶级制作一大步”，并体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同时，有媒体报道，网上流传中国电影股份公司部分分公司发出的内部通知，要求各参控股院线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做好影片的预售排映工作。更有网民披露，有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员工观看《流浪地球》，以激发民族自豪感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认识，而且要求军队、党员、学校包场。

在电影热度不断升高的过程中，终于爆发了“终于中国‘能够救地球’了”的评论，甚至有人直接喊出“只有中国才能救地球。”

不过，狂热声中一些理性和担忧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中国电影学教授郝建认为，这部电影的“精神核心还是和《战狼》系列一样”，“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目标，可以抹去一个人或许多人的生命，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的内在价值观是一致的”。他表示，编剧对未来社会结构的想象、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对个人的认识等方面的设计暴露出“对个体价值、个体尊严和生命缺乏理解和重视”，电影中人物行为所体现的内在观念“有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并反映出“作者扭曲的价值观。”

更有评论者认为，“集体主义美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为目标而存在的集体之中，个人的牺牲奉献变成了一种献祭式的表演。”

世界电影史表明，完全工具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电影虽然可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真正好的电影作品一定是那些具备“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价值的作品。

前苏联拥有完备的电影工业，在计划经济指令的创作环境下，苏联电影工业生产了一个时代的红色电影。这些电影的水准之高，使它们在七十年代经常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为赢回荣誉。而莱尼·雷芬斯塔尔拍摄的电影《意志的胜利》，虽然随着纳粹覆灭在全世界被禁映55年，但当年仍然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巴黎国际展览会金奖。

然而，当年“可以与西方比拼”的苏联瓦解了，“还差一步就可以打下世界”的第三帝国也灰飞烟灭了。这样的结果，更加昭示了“失道寡助”逆历史潮流必亡的铁律。

《流浪地球》上映的2019年，被许多人定义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对于当下的中国，中美贸易战、增长不断走低、贫富差距、边疆民族问题，特别是中国“扩张性策略”导致的世界对中

国看法转变，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实实在在的面对解决。电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拯救地球》的电影只不过是一场成人梦。



张艺谋新片《一秒钟》电影海报

《一秒钟》入围柏林金熊奖，该片原定2月15日参展柏林举行的全球首映，但因内容涉及敏感议题、片方在放映前夕不得不以技术理由宣布退出柏林影展

也许过于巧合，在《流浪地球》被极力推捧热映的同时，大陆电影导演张艺谋，携其新作“一秒钟”参加柏林电影节，但在最后撤出评比。值得一提的是，被评论家认为“走了弯路，有回归初衷迹象的张艺谋”，此部电影参评之初获奖的呼声很高。有媒体介绍，被官方定义为“因技术原因无法放映”的真正原因，无非是影片涉及了大陆发生的“文革”这一“敏感题材”。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有富足、强盛的愿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大发言权甚至更大的主导权也是自然。所以，不论是“鸿鹄之志”还是“洪浩之志”，有伟大志向和梦想当然是没错，不过也不要忘记了美梦是否“正当”和“美梦成真”的难度。中国虽然成为了全球第二的经济体，但人均还在世界排名

的下游，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色模式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世界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以及引发全球关注的中兴、华为事件，难道还不足够促成“崛起中国”的反思吗？这种状况的出现，绝不是单靠“外部势力压制中国崛起”的口号，就能自洽解释的。

中国本身有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处理，对于目前的中国，领导世界或拯救什么，从价值观和真正综合实力教的好象还不到时候。有评论者认为，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表明，亟需要拯救的恰恰是中国自己。当下的中国把自身的问题解决好，可能比什么拯救的虚妄更有意义，即使从自利的角度说，对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拯救，没有人敢反对这样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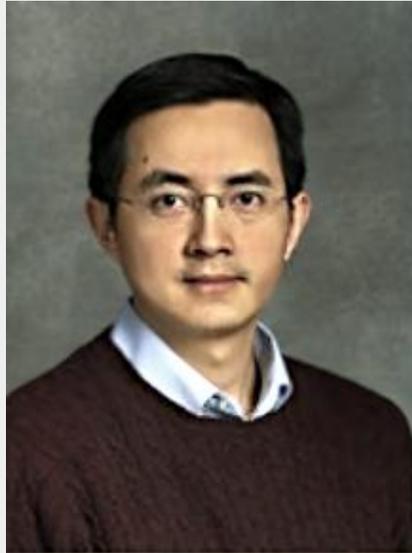
即使真如历史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终要对决，过往的历史也已表明，最终的胜者一定是“更文明的国家”。

有诗曰：一唱雄鸡天下白。即使没有雄鸡，天也会亮，梦就要醒。观影场灯亮之时，就是成人梦结束之际。如果刻意延续，其结果“地球人都知道”。所以，拯救地球不过是春梦一场，而心怀真诚的使中国成为“更文明的国家”，才是中国和中华民族未来道路的正确选择。❏

[【返回目录】](#)

## 许鹏：《流浪地球》里的科学常识错误实在太多了

[许鹏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土木机械系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许鹏科学网博客]



本文作者许鹏教授

科幻电影来源于想象加上一定的科学常识和推理。好的科幻一般需要在科学事实和幻想中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如果严重脱离科学基本规律，那就是魔幻小说了。如果只是冰冷的科学事实，没有艺术的想象和加工，变成记录片，也会索然无味。

我个人的感受是一般读者能够接受 1-2 个大的突破科学常识的假设和幻想。如果违背科学基本原理的场面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毫无必要的地方违反基本常识，就是烂片一部。

《流浪地球》拍摄场面宏伟，可是实在不敢恭维科学顾问的水平。为了拼凑剧情和突出推力发动机的视觉效果，突破生活常识和科学常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恐怕还会让中小學生接受错误的物理知识。让人不吐不快。

首先是地球必须要脱离太阳系的假设。记得原著里是预测太阳要发生氦闪，地球要被吞没。氦闪当然是作者编出来的。但是这个假设读者一般可以接受。这个比电影里莫名其妙的一句“太阳在膨胀”要显得靠谱多了。就像很多科幻小说假设拥有一个时光机，一个大脑阅读器，通过黑洞穿越未来一样。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假设。但是接受不了因为粗心大意，或者没动脑子，或者对毫无必要地对基本物理常识的违背。

就像武侠小说里面的武功，人人都知道是假的，但是不耽误大家欣赏剧情。可是要是金庸写的降龙十八掌一巴掌把对手打到月亮上。估计这样的武侠小说谁也不要看了。科幻小说也一样，有读者可以接受的艺术夸张的限度，特别是所谓的“硬”科幻小说。

再说一些细小的吐槽点。

1、电影里无数的雪景。地球已经是零下 80 度了。被推到接近木星的位置，地球所有的江河湖海早就都被冻住了，大气中哪里来的水份，怎么可能还会下雪？

2、再说人工地下城和离子发动机。地球这么大，好好的地下城你在摇摇欲坠，轰鸣不断的的发动机在下面干什么？违背常识。

3、电影快结束的时候，一瓶伏特加砸在监控摄像头上，然后就能烧毁空间站。且不说空间站，导演明天可以把一瓶茅台砸在自己家的电视屏幕上，你看看会不会着火。当然那个监控摄像头也很神奇，好好地你干嘛刺啦啦刺啦啦地冒火星？您到底是摄像头还是焊枪？



4、一群人为了运送一个神奇的“火石”丧命。估计导演同志是个烟民。看到发动机想到的就是什么打火机，打火石。导演应该明白原始人用火石，后来人们发明了火柴，凝固汽油，电子打火。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原理，在未来高度文明，一个发动机需要一个大石头才能点燃。当然更神奇的是，这个石头被手枪打了几下就神奇地报废了。石头啊石头，你到底是个啥？是打火机上的打火石，还是个人造大芯片？

5、伟大的上海城被地球停止自转的海啸淹没。然后温度急剧降低，被冻在冰河里。当然了冰河似乎有变成了峡谷，峡谷里又有了很多纷纷落下的石头。真心想请教一些导演，这是怎样的一个物理变化。当然这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这些曾经的上海的高楼大厦在经历海啸和速冻之后，电梯井里没有水没有冰。是一个完整的空井？难道从东方明珠到上海中心，用的都是传说中的防水电梯？

6、用发动机停止地球自转，应该是个缓慢的受控过程。受控过程不应该发生海啸，即使发生海啸也应该有预案。好好怎么就变成姥爷拯救落水孤儿了？

7、刘男主（爸爸）所在的宇宙飞船是通过旋转来形成重力场的。旋转停止，重力场会消失，人就

会浮起来。这点电影基本正确。可惜导演忘了动量守恒了。如果要让宇宙飞船的一部分停止旋转，另一部分就必须反向飞转才行。在太空中没有大地，旋转是不可能通过刹车片能停下来的。

8、地球赤道长 4 万公里。北京纬度接近 40 度。也就是说北京到赤道的直线距离将近 4400 公里。一个还是橡胶轮胎的重卡车在冰雪交加的野地，零下 80 度的低温，途经上海杭州，十几个小时就可以跑完在整个行程。这让人难以接受。如果人类转入地下生活的话，更有效的交通工具应该是地下的隧道。



9、木星是太阳系行星中自转最快的一个了。差不多 10 个小时转一圈。可是电影里几乎所有的木星镜头都是大红斑，早也是大红斑，晚也是大红斑。大红斑正对着飞船，大红斑正对着地球上的观测者。大红斑啊大红斑，你可知道，地球上有个导演有多么爱你。

重核离子发动机也是电影的大戏。据说反反复复做了很多次模型。可能是导演太爱自己做出来的模型了。很多戏都围绕着发动机的场面。重核发动机到底是啥原理咱们搞不清。反正是烧石头转化成离子推力。观众忍了。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大家是可以忍受一两个极端的假设的。可是都是未来科技高度发达了，怎么还会荒谬到开卡车拉石头？这些事应该是机器人更加靠谱一点。或者直接用传送带运送石头。哪里的石头不是石头。

地球停止自转完全没有必要。发动机可以按照地球轴线的方向上布置。这样地球可以保持自传，同时沿着轴线方向前进。地球保持自传很重要，不然朝向太阳的那面很快就被烤糊了。

另外地球停止自转了，地球的磁场保护就会消失。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会让任何生命几分钟就死亡。你可能说地球太阳系是平的，地球需要沿着水平方向才能到底木星轨道，脱离太阳系。不过既然既然发动机的力量最终都可以把地球加速到千分之五的光速。让地球慢慢地转 90 度改变一下运动方向也不是什么问题。地球最终也是要改变运动方向的，因为人马座并不在正正好好好太阳系的平面方向上。

如果再深究一下，地球不可能是采用不改变轴线方向的方式离开太阳系的。因为地球的自转赤道和太阳系的公转黄道有夹角。简称黄赤夹角。如果试图在公转平面上到达木星轨道的位置，就不可能按照赤道方向逃逸而去。

最后说说地球借助木星引力脱离太阳系。

按理说这段是极其容易出戏的，可以用电影的手法表现得惊心动魄。可惜《流浪地球》电影在这个环节上错得莫名其妙。

电影里莫名其妙地来了个木星引力波动。星体得引力极其稳定。亿万年都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太阳的引力，还是地球的，还是月亮的。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引力只是跟质量和空间距离有关。木星有四大卫星和六十多个小卫星，亿万年来木星引力要是不稳定，这些卫星早已坠入了。木星引力你波动个啥。好端端早不波动，晚不波动，亿万年你都不动，偏偏等到地球快来得时候，春心难耐，就情绪激动了，一下子引力波动了 9%。木星啊木星，你这样对得起围着你鞍前马后转了几十亿年的那六十多颗月亮么？这段是典型的为了编制紧张故事情景，胡编烂造。

再说说点燃木星这段。这段以色列的科学家说的很对。完全不靠谱，成功率是 0。为什么呢？木星 90%的氢组成的。木星的总质量是地球总质量的 318 倍。地球的大气中氧气的总质量是  $1.4 \times 10^{18}$  kg，木星的质量是  $1.9 \times 10^{27}$  kg。也就是说，即使地球上大气层中所有的氧气都被木星掠去，那么木星中氧气的浓度也只有十亿分之一左右，远远低于闪点。这个浓度相当于多少呢？正常人放一个屁的气体质量是 0.0371 克，用这个数字乘上十亿倍就是  $3.7 \times 10^7$  kg。如果是大气体积就是三千万立方米的空气。差不多是上海黄浦区一个人这么高的总空气质量。如果你相信因为你在上海的黄浦区放了一个高浓度硫化氢的屁，同时有人划燃火柴，就能把黄浦区都点燃炸掉，你就可以相信电影里的情节了。

再说说木星掠夺地球大气这段，地球大气是不可能地球撞击到木星之前，提前被木星掠夺走的。就像你站在一块陨石上，高速一起撞向地球，你是不可能因为被地球先吸走一样。这个道理伽利略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已经证明。阿姆斯壮也在月亮上把铁锤和羽毛一起落下。初中课本里对这个现象叫做重力加速度原理。在木星引力作用下，两个不同密度的物体下落的加速度是一样的。超木星奔去的时候，地球上的每个物体都有相同的速度和加速度。地球上的大气层也不例外。伽利略同志要是看了这个电影估计能从坟墓里气死过来。不明白为什么导演犯中学物理的常识错误。

另外一方面地球也是有引力的，虽然地球引力比木星小 300 多倍，可是别忘了那个时候，地球的大气层距离木星 7 万多公里，距离地球只有几公里。地球对大气层的引力远远比木星引力大。如果大气层是小伙子，木星就是 7 万公里万的大眼睛姑娘。大眼睛姑娘再好看，小伙子也是无力推开怀里的春姑。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为了艺术，老百姓不想深究那么多，木星上是氢气，地球大气有氧气，这么好的结合点来一个火柴多过瘾。

那就看看这个火柴有多不靠谱。按照电影里说的，相撞之前，木星和地球的距离是 7 万公里。7 万公里靠发动机的火焰是不可能够到的。火焰这种现象只能在大气层中存在。离开了大气层你能看到的只是离子或者物质的流动。另外火焰的速度通常在 10-100 米/秒这个数量级。最快的火焰需要 70 万秒，8 天时间才能走完 7 万公里的行程。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氢弹爆炸，蘑菇云也没有脱离到大气层之外，因为大气层之外不可能有蘑菇云。火焰更不可能逃逸到大气层之外。

如果是等离子发动机，Plasma engine。等离子流是没有火焰的，只是粒子束在电场的加速下反向喷射。所以离子的温度一般和环境温度没有多少区别，在地球上，是常温温度 300K 左右，在外太空只有 100K，摄氏零下 100 多度。氢氧最理想条件下的燃点温度 400 摄氏度，远非等离子流能够点燃的。即使电影里的那个离子束是有高温，在太空中经历了漫长的 7 万公里的行程，早已变得冰凉。

如果你真的相信木星可以被点燃的，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火焰和宇宙飞船去撞击木星。木星和地球一样，分分秒秒都有无数的流星划过。那些流星在进入木星大气的时候，都会高温燃烧。可以说每分每秒都有火柴不停在点燃木星。根本不用刘男主去献身。

当然，为了艺术，我们也忍了。但是实在不能忍的是导演认为这样可以把地球炸出来，逃逸木星的引力。可能导演忘了地球是什么构成的。地球最表面是地壳，这些是由轻薄的岩石构成。内部大部分空间是液态物质，最最中心是铁与镍的固体硬核。地球不是实心的一块石头。更形象的比喻是个鸡蛋。地壳非常的薄弱。你在鸡蛋边上发了一个炸弹，试图用冲击波，把鸡蛋炸的远远的。结果可能不是鸡蛋被炸远了，而是把蛋壳打破了，当场炸的粉碎。

当然了，这样的爆炸冲击波永远也不会到达鸡蛋。爆炸之所以会产生冲击波，那是因为大气的原因为。如果木星发生了氢氧燃烧和爆炸，冲击波也永远只会留在木星的大气层里。在太空中的爆炸事件，除了光和辐射之外，什么动力都不会产生。2009 年木星曾经遭受过彗星撞击事件，又被称为韦斯利撞击事件。哈勃望远镜有幸记录了全部过程。撞击之猛烈，能量之大，留下的疤痕和木星的大红斑一样大，和地球的直径差不多。即使这样，也没有看到任何冲击波能够逃逸木星的引力。还是那句话，太空中是不会有冲击波的，冲击波只存在于大气层中。

最后总结一句我看到的一个影评人写的话。这个电影拥有宏大的场面，试图描述人在灾难面前的情感起伏。唯一缺乏的就是 common sense。

除了电影缺乏 common sense，下面是给号称喜欢“硬核”科幻的脑补一道题目，中学毕业的应该都会做。

如果把地球加速到 0.5% 的光速。假设你有一台无限效率，无限牛叉的发动机，能够把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零代价地变成等离子体，然后再毫无代价地加速到光速，然后朝发动机的反向喷去。根据动量守恒原理。那么你也需把地球上 0.5% 质量的物质喷走，才能把地球加速到 0.5% 的光速。考虑到到

达目的地星系的时候，需要同样做减速动作，你需要再消耗地球上 0.5% 的物质做减速运动。不然这么高的速度，人马座恒星引力场捕捉不了。

所以即使是理论上最最最牛叉的发动机，你也会消耗 1% 地球的总物质。地球上地壳总质量包括一切江河湖海高山大地的总质量，占地球总质量的 0.32%。地壳平均厚度 17 公里。电影里地下城深度是 5 公里，显然导演同志不知道很快连卡车带地下城市都要喂给发动机。地球上地壳都被发动机喷光了也不够。除非人类能找到在炽热的岩浆中生活的方法，否则地球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太阳系吧。

人类需要善待地球，因为哪里也去不了。 🌍

[【返回目录】](#)

## 陈威威：《流浪地球》高票房是计划经济回潮的一个样本

[陈威威 中评网、中评周刊执行主编。本文为 2019-3-6 中评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

《流浪地球》票房“突破 45 亿元，仅次于《战狼 2》”。

该片时长 125 分钟，据说在审查过程中被删去近 30 分钟，于是这部电影从头至尾不放过每一分钟的铺张视听特效，影片结束感觉走出了电影特效工厂、不是电影院。

有网友称《流》片是《战狼》串了片场，主演《战狼》的吴京在《流浪地球》中虽不是主角，但吴京在娱乐圈专职高调“爱国”的身份，已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标签，有他参演就意味意识形态规定的电影模式必是主题先行，以表达与“厉害了我的国”同为系列。



2002 年上映的经典悬疑科幻电影《飞向太空 2002》剧照  
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史蒂文·索德伯格、斯坦尼斯劳·莱姆编剧的科幻影片，  
根据科幻作家斯坦尼斯劳·莱姆的经典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改编

### 编、导、演欠缺艺术功力

《流浪地球》没有一以贯之的讲好故事，也没有令人回味的人物，是中国式的政治正确的导向指引？还是主创们另有隐情？科幻作品是在客观现实和对未来无限的思考之间提供的一个交叉地带，科幻作品的灵魂仍然是关注公共生活的价值思考，还要看你肚子里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才具有一个设置情节和技巧的前提。尤其科幻电影的编剧，多少需要一点未来学基础的形而上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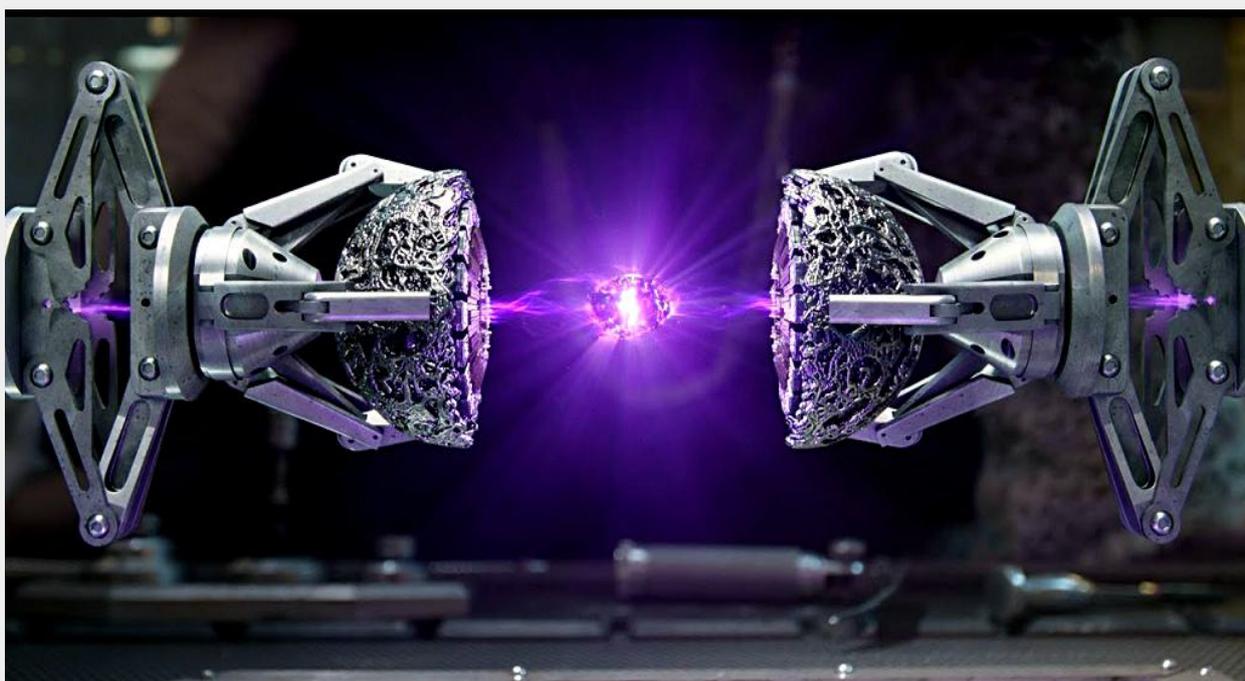
不知《流》片的编导主创们是否活得太顺太舒适，除了天赋异禀的天才之外、没有苦难阅历的人是没故事的人，欠缺超越现实利益的政治理想、道德与审美理想的人是凡俗的，难以和艺术结缘，更难以驾驭科学幻想的宏大叙事。

现实到骨子里的人不自由，没有自由精神你就离艺术远一点，否则两伤。

哪怕你有高学历、哪怕你读了很多书，未必能够补偿欠缺的灵商和艺商。眼下有多少烂电视剧中的英雄不是虚空的、标语口号式的套中人？



美国悬疑科幻片《超时空接触》剧照，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1997 年上映



2014 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银河护卫队》剧照，詹姆斯·古恩执导

全面的艺术修养是为某项艺术门类的表现力提供支持的基本底色。

《流浪地球》脚本的文学功力不够。全片故事结构不成熟，整体叙事与角色的必然性格脱节、叙述模糊混乱、语焉不详；人物内心活动的心理描述粗糙简陋，观众难以透过剧情与人物共情。

音乐基本要素的掌控能力欠缺。烘托剧情需运用的音乐艺术手段实在太重要了，而编导演们对此无意识，致使人物关联的情节展开没有舒张起伏的节奏变化，电影本来就是视听艺术，主要人物情感

变化应有对应器乐或旋律主题同步、给观众带入感，但是听觉部分全被咋咋呼呼的特技音效占据了，伴随角色情绪、心理、性格的配乐压根儿就没出现。

戏剧、舞台剧的基本功欠缺。人物性格和彼此关系的情节展开设定单一、干瘪、无情、无趣，角色情绪变化和人物冲突没有前埔后垫的衔接，必然虚假。

美术和造型设计并无新意。造价昂贵的道具和行头，仍然是对好莱坞的照搬，哪有中国味道。

景别和机位的镜头语汇单调贫乏，前期的分镜头脚本和后期剪辑没有交集、无章法。

《流》片从头至尾都是密集拼合的视听特效、毫无克制。剧情的紧凑不等于凌乱堆积，用外在浮夸的法子给观众挠痒痒，喜欢看热闹的孩子或许会为炫耀特技叫好。《流》片尊享了独家的巨额票房满贯，但影片本身更像是为某种宣传制作的超时长的广告片。

一部好电影可以传递向往社会昌明的价值观，计划经济模式的高票房，充其量向大众传染屈从权势的人云亦云。《流》片是否推高了政治审查的严苛力度？还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不在审查范围内？总之，贺岁档期小情侣们进电影院花钱没的选。

#### **45 亿高票房，是市场之外所得**

如此《流》片的高票房现象，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会陌生。

1966 年到 1976 年那十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数千家音乐、舞蹈、戏曲剧团和各军种文工团的演出，只能依葫芦画瓢的去接受“样板团”的“培训”，只能原封不动的复制那八个样板戏，不准走样、不准独创。

《流》片的高票房是高不过那时在全国翻来覆去放映的几部电影票房的，如《地道战》、《地雷战》、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广阔的地平线》，而且看电影是各团体、机关、工厂组织的集体行动，不喜欢也不能说出来，怕不留神被举报成“现行反革命”。《流》片的高票房目前还没有可能高过文革期间计划经济操控的那般极致，但模式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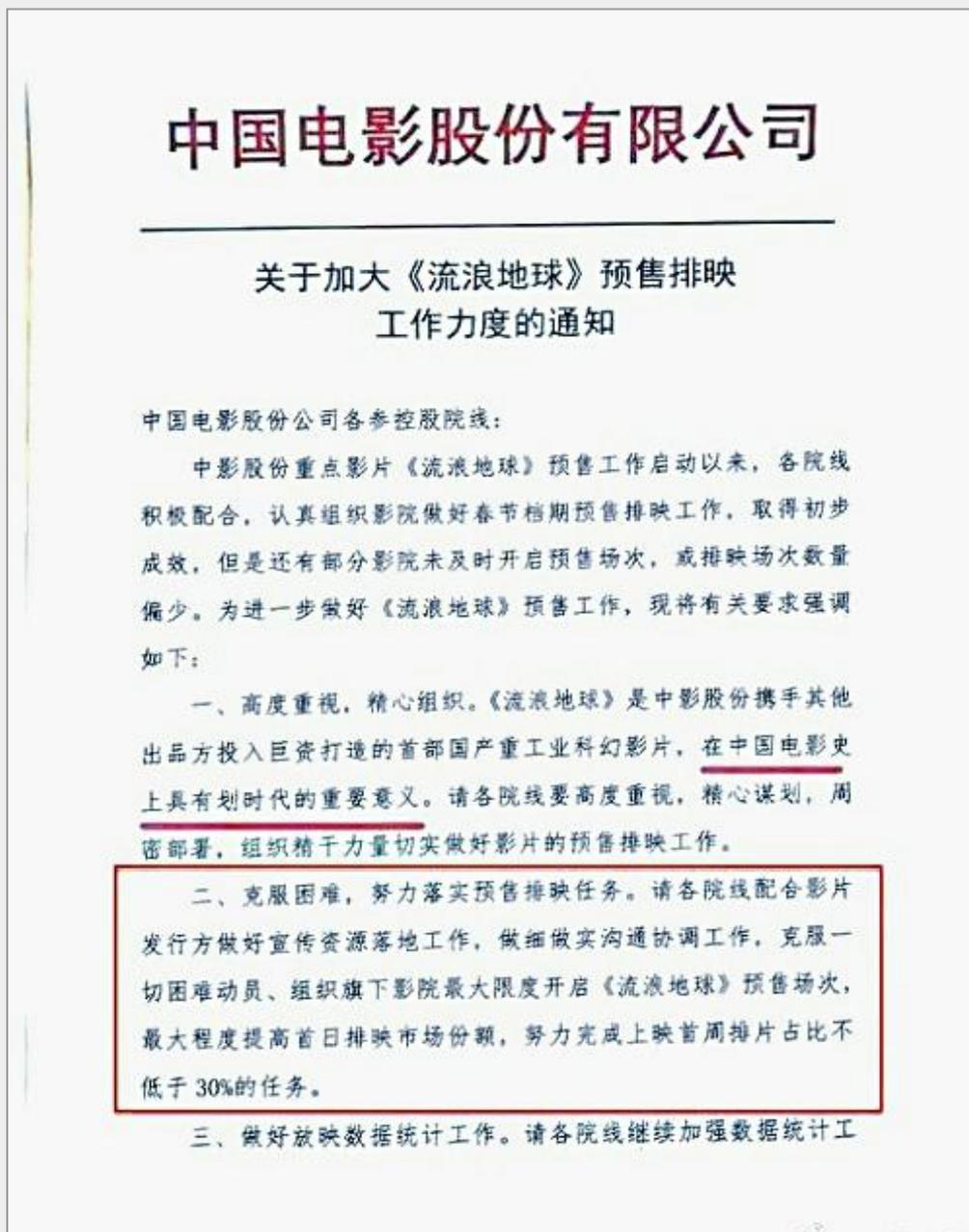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前不久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也成为向境外高调推销《流》片的营销员，据环球网 2019 年 2 月 13 日报道，当外媒记者问她张艺谋新片《一秒钟》无法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放映的问题时，华春莹的回答是“外媒记者说的事情应该问相关主管部门”，接下来是她要讲的重点，她说：“我知道现在大火电影是《流浪地球》，不知道你看过没，建议你去看一下”。

《流》片的票房记录背后，是动用了举国体制吗？所谓“45 亿高票房”难道不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娱乐市场的干预吗？那就不是真实的市场行为所得。

中影公司的一份内部通知称该片“有划时代的意义”，要求各院线“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在上映第一周的排映占比不得低于 30%。

国内影院的春节档期之所以成为高票房收益的规律，源自 1997 年冯小刚在内地首次以贺岁喜剧

片导演的《甲方乙方》的成功，打开了假日电影消费市场。此后十多年来每逢春节档期影院就成为各路主创们名利双收的竞争大机遇。而娱乐消费市场产品在高度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下，严格的审查注定排除掉有自由思想的作品，但只要你现实的顺应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去编故事、就能获得唯一的高票房。



中影公司以官方身份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各院线“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流浪地球》，须在上映第一周的排映占比不得低于 30%，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军队、党员和学校组织观包场看，以及各大网站、影视网站的影评必须对该片进行宣传

环球时报还有报导，《流浪地球》在香港有 40 多家影院排片，票价从港币 60 到 120 元不等。以旺角百老汇影院为例，2 月 28 日晚上 9 时 50 分场次的《流浪地球》，开场前 1 个小时近 300 个座位只卖出去 7 张票。同一时间段，位于西九龙的嘉禾天空影院，176 个座位还剩 155 个。据《环球时报》

解释，是因为当地的经济现状和文化差异所致。

公开透明的竞争被挡在外，内地艺术市场的消费者无可选择的情景再次重现，自由竞争的市场退出，《流》片的高票房，要拜计划经济的回归所赐。

### 《流》片剔除美国，向俄罗斯示好

《流浪地球》公映时间，正逢中美贸易战之际，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言和达成，或与俄罗斯兄弟关系发生摩擦，不知这部“叫好又叫座”的《流浪地球》，是否会被禁映冷藏呢？

《流》片中有一个操着俄语的外籍英雄，较为清晰的配角，标志俄罗斯才是配合中国吴京们拯救地球的行动大国。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在影片中的联合行动中只字不提，美国是不可否认的科技强国、却在“地球危机”时刻，美国似乎被《流》片从地球上抹掉了，而《流》片仿效的灾难科幻片视听特效的技术手段，却正是从美国好莱坞舶来的。

中美贸易谈判关键时期，美方要求我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制裁中兴通讯，美国商务部宣布 7 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销售芯片等零部件，中美关系恶化将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更多重创，此刻即使推出中国拯救地球的科幻大片，就越发显得虚妄躁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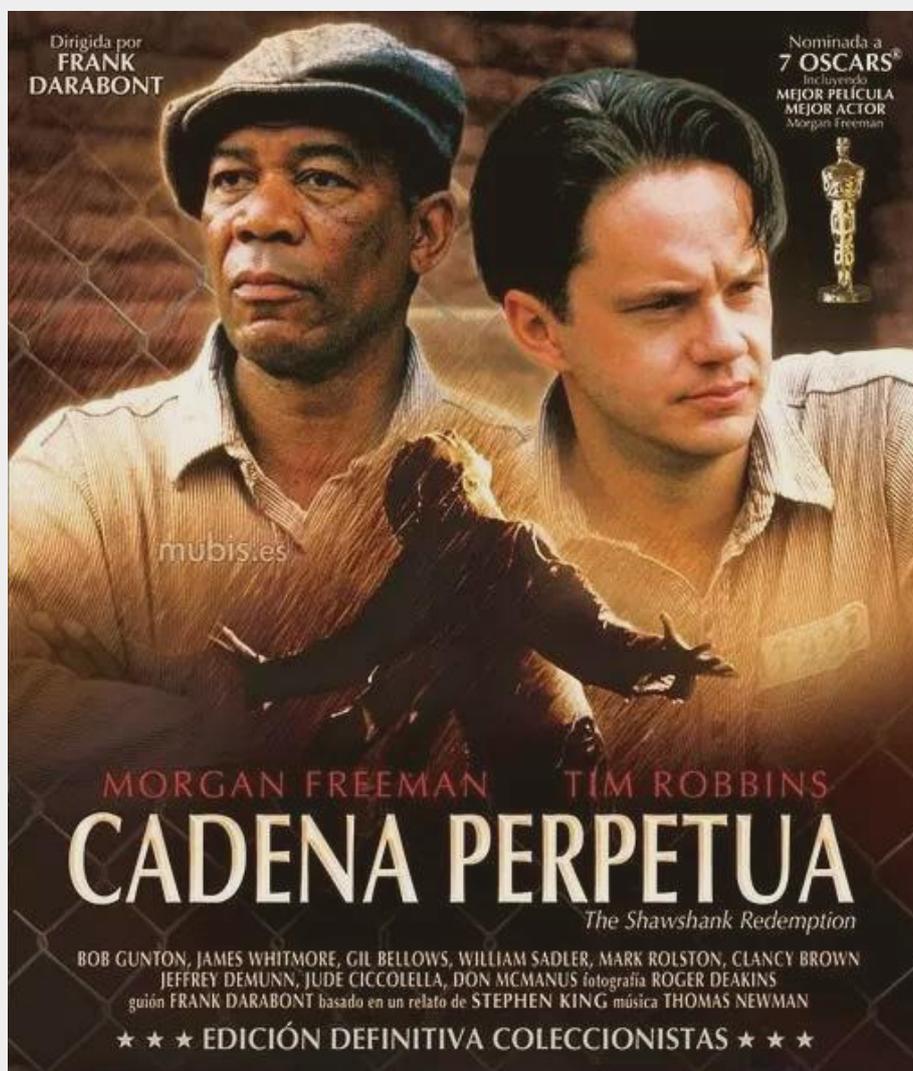
美国科幻灾难片《全球风暴》剧照，由迪安·德夫林编剧并执导，  
制片成本 1.2 亿美元，2017 年公映

《流》片何以在中美贸易战白热化时刻强化不友好？不是给现实的“爱国行动”帮倒忙吗？低估艺术作品给国际关系带来的负面后果，就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了。

有思想深度的经典好电影，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投入，本人最难忘的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肖申克的救赎》和 2004 年的法国片《放牛班的春天》，我数不清看了多少遍。每看一遍都沉浸其中难以入眠。《肖申克的救赎》告诉人们在独自经历艰难的时刻、如何怀着一线的希望去，那份苦难

就会令你强大。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被关在肖申克监狱 30 年的黑人囚犯瑞德有段台词很多人都熟悉：“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会恨它，慢慢你就会习惯它。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你离不开它，那就是被体制化了”。



《肖申克的救赎》电影海报

改编自作家**斯蒂芬·金**的原著作品《四季奇谭》，由**法兰克·戴伦邦特**执导，  
1994 年在美国上映

影片还引用了《动物庄园》中的一段话：“激烈的批评被消灭了，他们再来消灭温和的批评，等到温和的批评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消灭那些保持独立不赞美的人了，到最后，如果鼓掌不起劲，都会被消灭”。

在一个不能拥有个人立场的时代，观众难于看到完整的国产好电影了，假如连批评之声都不能承受，“我的国”又如何输出“厉害”呢。 🇨🇳

[【返回目录】](#)

## 郑风田：蒙牛吃上国企垄断盛宴不值得欢呼

[ 郑风田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本文转载自 2009-07-10 财经界 ]



本文作者郑风田教授

中粮联手厚朴基金以 61 亿港币收购蒙牛公司 20.03% 股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食品行业最大一宗交易案。

有关这次收购案有许多解读，包括蒙牛的差钱不差钱，还有国进民退，强强联合，打造全球知名品牌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过于看高了这两家公司，短期来看，的确可以刺激一下双方的股价，但从长期来看，一个是草根式的民企混合体，另外一个管理差强人意的垄断国企，如何整合好双方的优势资源，规避双方的短板几乎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合并到底对双方究竟有多少好处，还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蒙牛虽然这次也吃上了国有的垄断盛宴，但真的不值得去欢呼，因为实在是找不到欢呼的理由。

蒙牛的奶业原罪到现在还没有赎完，丑闻缠身的蒙牛能否借这次购并案摆脱困境还很难讲。

蒙牛自 1999 年成立，到目前已用蒙牛速度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的奶业巨头，但这样过于快速的拔苗助长，也使蒙牛乃至整个中国奶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原罪。奶业是一个极特殊的行业，一方面食品安全是它最核心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国分散的奶农养殖安全性又难以保证。三元、光明等正是依靠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牧场与奶源基地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而后来的蒙牛要想居上，如果也这样稳扎稳打地建自己的奶源基地，想成为中国的乳业老大不知得熬多少年。所以蒙牛采取了另类的战略，那就是抢逼围的战略，说虎口拔牙也可以，说横刀夺爱也行，反正是蒙牛为了奶源基地展开的残酷的竞争。这也拉开了中国奶业史上最悲惨的一面，为了竞争，大家都拚命许诺、拚命地放松标准、降低质

量，其结果也必然导致带来奶业的整体道理论丧，最后恶性竞争酿成的苦酒，还只能让大家共同吞下。

速度成就了蒙牛，但过分迷信速度，又使蒙牛大厦摇摇欲坠。三聚氰胺的伤口还没有流完，蒙牛过分夸大宣传的特仑苏 OMP 事件，又让消费者对于蒙牛乃至整个奶业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这些危机不但严重打击国内的消费者，还引来蒙牛的生存危机。如何改变蒙牛过去的短期行为，重塑国民对乳业的信任，蒙牛还一直很无力，一直没能找出良方。

这次中粮购并，牛根生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蒙牛与中粮合作属于强强联合，符合市场规律也顺应国际形势而在品牌方面，中粮是中国食品行业的老大；其二从战略资源来看，整合之后更加全球化。其三是从产业链看，从原料到市场，能加快衔接到餐桌的一体化。按蒙牛牛根生的理想，就是要能不能做到中国出一个具有百年基业的，能够具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集群。

虽然老牛的理想不可谓不宏大，但目前蒙牛的质量安全炸药引线并未彻底拆除，如果重塑国民对蒙牛的信心，非一两次联姻所能解决。蒙牛如何作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粮集团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贵为行业龙头，但究竟有多少核心竞争力要打一个大问题。

中粮与中石油、中石化一样，是我国国字头的超级垄断公司，靠国家强制性的垄断起家，到目前为止还垄断着我国的小麦进出口。其前身是在 1952 年于北京成立的中国粮谷出口公司、中国油脂出口公司和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中粮集团子公司包括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食品和中粮控股，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粮屯河、中粮地产和丰原生化，还包括中粮地产、酒店事业部，中国食品巧克力部，中国粮油油脂部、生化能源事业部、小麦加工事业部，中粮肉食禽肉部、畜肉部、中粮粮油粮贸部、饲料部，中粮包装等业务。

按国际垄断公司的一般规律，通过垄断赚取的利润一般要向国内的供货者返还垄断利润的，比如澳大利亚小麦局、加拿大小麦局，统一掌控本国的小麦对外谈判价格。但他们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这两个垄断性的机构每年都会向国内的麦农返回在全球市场上赚取的超额利润的。 ■

[【返回目录】](#)

## 高敏：值得警惕的“国进民退”

[ 本文首发于 2018-09-05 作者微信公众号：高敏观察 ]

在央行最近组织的企业座谈会上，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发言很有意思，开场白说：

“北京各家银行的行长我都见过了，但是今天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总行的行长，我就准备说点心里话、何语速很快，就跟爆豆子一样“现在的民营企业太难了，如果一行长给我批准一个银行，我一定拯救那些企业于血泊之中，一个一个地救。”

全场哄堂大笑，大笑的同时，背后是大大的辛酸。

先来看一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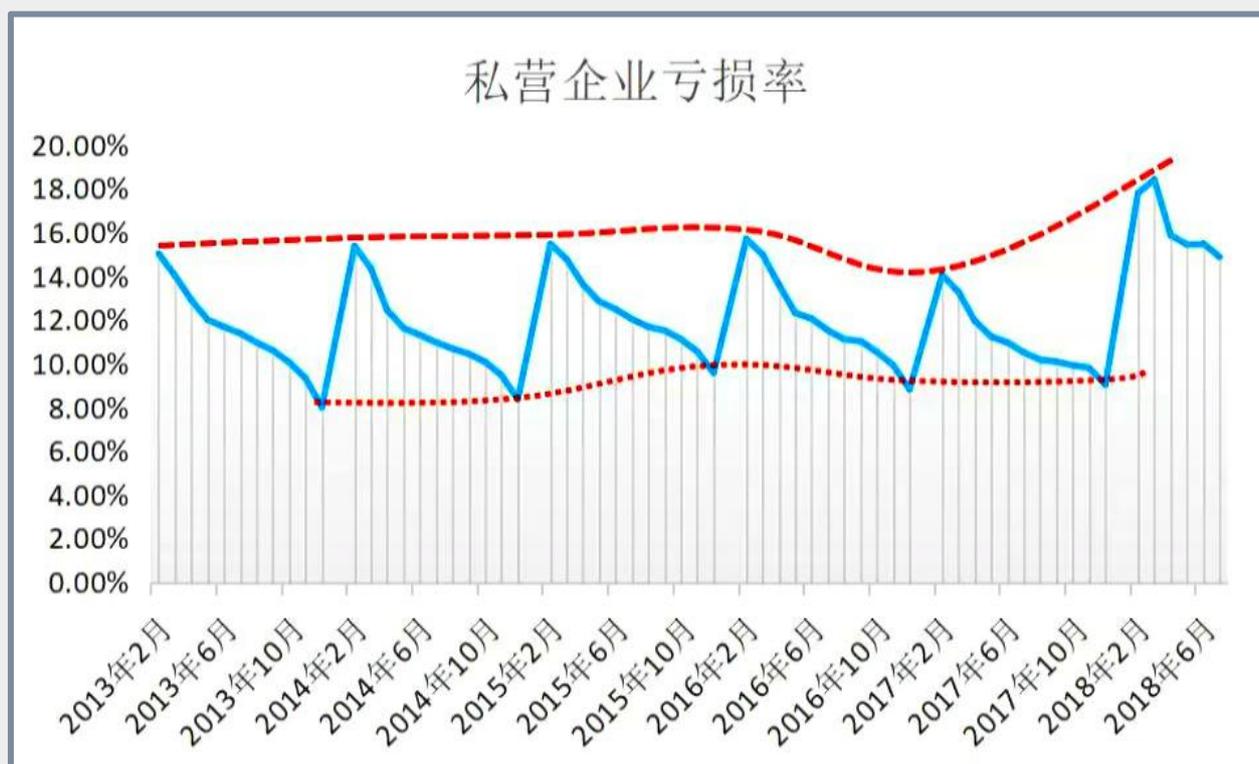
“2018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2%，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31.5%，私营企业增长 10%，利润继续保持分化。”实际上，即使放在全口径的统计中，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仍然增长 21.1%，而这是在营业总收入仅增长 10.2%的情况下取得的。

是的，国企和民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在信贷投放上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分化：从增量信贷来看，2016 年国有企业新增贷款 6.9 万亿、占据 78% 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新增贷款仅为 1.5 万亿，只占新增贷款的 17%。而在 2013 年之前，这个数据还高达 60%。



从亏损企业数量看，去年年底以来，私营工业企业的亏损比例（亏损企业数量/企业总数量）明显提升，在今年年初创造了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亏损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但我想政策上的原因值得我们更加重视。

纵观从 2016 年到现在，实际上是国企去杠杆和民企加杠杆的过程，分化的原因可能是“去杠杆”政策与“国企民企”区别对待共同导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企和民企在融资上一直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差异，国有企业资金成本非常低，获取信贷资金的难度也相对较低，金融机构从自身风险控制出发，都愿意将资金贷给具有一定“国家信用”属性的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融资则非常困难，由于难以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过去几年，不少国有企业干脆变成了“类金融机构”，通过从银行获取低成本的资金，再通过融资性贸易形式“贷款”给民营企业，资金成本平均在 15%-20%，但即使如此之高，还有大量民营企业愿意接受。而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也反映了民营经济的资金短缺。

一方面，严格的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虽然政策本意是好的，但是由于长期国有和民营企业获取资金的“区别对待”并没有改变，客观上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进一步加剧，严重的资金短缺必然导致了严重的经营困难。

即使是上市公司，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上文提到的东方园林便是如此，今年 5 月，其公司原计划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最后仅仅卖出 5000 万元，最近作为典型企业后才解决资金问题。而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超过 90% 的达到近 500 家。

另一方面，由于国企（含国企控股）目前几乎在全行业都有覆盖，在资金短缺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可以相对容易的获得融资，而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弹药支持，折旧导致国企和民企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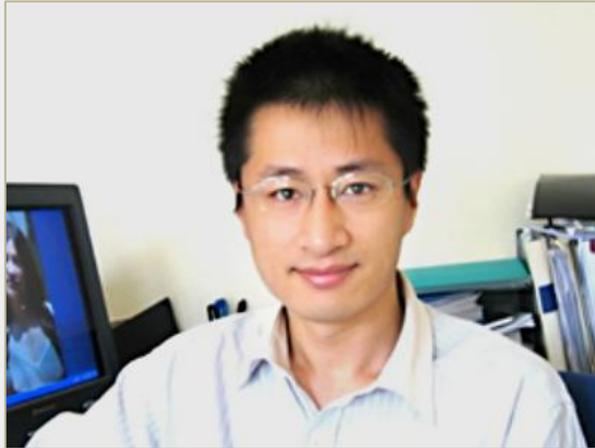
去杠杆本身是必要的，但前提是确保民营企业可以获得同等的融资机会和成本，同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我们要小心外围风险的扩散，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这一大背景下，如果未来外围需求发生趋势性逆转，再次引发中小企业破产潮的可能性很大。

正如上周经世沙龙的核心观点一样：信心就是黄金，减税比扩大投资更提振人心！

[【返回目录】](#)

## 陈青蓝：东星航空倒在国进民退大潮中

[陈青蓝 青年经济学者，专栏家。本文首发于 2009-08-27 网易财经]



本文作者陈青蓝

本来，一个企业的生生死死在市场经济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在当前这个时刻，东星的倒闭却显示出很不寻常的一种趋势。

东星航空去年亏损 5 亿元，现在终于被法院判了死刑。笔者在民航界干了多年，深知对一个稍有规模的航空公司来说，这 5 亿元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亏损。民航业的特点是收入现金流大，大进大出，因为飞机每天都在各个航线之中奔忙，“飞机一响，黄金万两”，一个航班的收入多则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客座率再低也有几万元，一个中等的航空公司一年收入就可以有几十亿元上百亿元，做金融业的都知道，银行放款是很喜欢这种收入现金流量大的企业，哪怕它利润微薄也没关系，只要钱能够转起来，银行就不怕收不回贷款。5 亿元对东星这样的航空公司来说，不过就是一两个月的收入而已，只要它做下去，哪有还不上这个帐的问题。仅仅亏损 5 亿元，就判一个航空公司死刑，的确太武断。而且今年以来国内航空业的形势转好，各家航空公司都在扭亏为盈，如果让东星继续经营下去，它也会很快扭亏为盈，欠各方的债务也会相应清偿，这样的话，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尽管国家信贷规模上半年达到了 7.4 万亿元，但东星就是得不到银行贷款，也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融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民营企业。在中国，民营企业是一种很脆弱的物体。以国有资本垄断的金融业对民营企业信任度很低，平时就极难获得融资，一旦你亏损，要融资就基本不可能。

就在东星被判死刑期间，我们看到，巨亏 139 亿元的东方航空正在春风得意地收购上海航空，一个亏损到要倒闭的企业还收购别的大型企业，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算是奇迹吧。老话说“亏得当裤子”，东方航空只因为是国有企业，不但不必当裤子，而且还财源滚滚，钱花都花不完，不但有银行巨额贷

款伺候，而且还有国家直接注资，今年国资委就对巨亏的东航注资 70 亿元。对这些国有航空公司来说，钱是最不用发愁的事情了。

去年到今年以来，4 万亿元振兴计划的资金进入了“铁公机”领域，上半年 7 万多亿的贷款也绝大部分进入了国企的腰包，所以我们才看到各个行业的国企扬眉吐气，钱都不知道怎么花了，左拍一块地，右拍一块地，一块开发房地产、卖房子，一块留着自己住。既然有这么多钱，说什么“亏损”“倒闭”，那不是说梦话吗？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国有企业包括东航、国航这样巨亏的企业都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像东星这样的民营企业却惨淡经营、破产倒闭。这样的情景显示了一个让人忧虑的趋势：国进民退。

我相信这样的国进民退并不是政府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不是有意要消灭民企，从现实分析，这种趋势应该是国家推行的经济拯救计划的副产品。根本问题还在于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营银行和其他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发展起来，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受阻。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和经济拯救计划，大量的资金必然流入国企，而另一方面民企却大旱求甘霖而不得，国进民退就是必然的结局。然而，这样的局面，对中国经济可不是好事。国企的效率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领略过了，当时的国企组成的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论），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一个以国企为主的经济体有效率的先例。所以，我们才应该担忧在东星航空倒闭与东方航空兼并上航这两件事背后所显示的趋势。 ■■

[【返回目录】](#)

## 李昌庚：“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 李昌庚 法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2010 年 4 期《西部法学评论》，注释略去，转载请注明 ]

**内容摘要** 无论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或掩盖国有企业固有弊端。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源于其他。即使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往往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和行政垄断倾向，决定了国企改革在市场竞争领域依然是“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方向。公有制和私有制本是经济学中性概念，也不是对立命题，均为经济发展的选项。但如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加以政治意识形态化，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是背后的传统意识形态。

### 一、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私有化现象？

A 文认为，“私有化在全球实践的结果却是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教训不少。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的这场愈演愈烈、百年不遇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私有化的神话的光芒黯然失色”等。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作者忽视了世界各国私有化的前提和背景。之所以世界各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掀起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浪费严重、普遍亏损等固有弊端的显现。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均存在上述弊端，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私有化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或掩盖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也就是说，不能因为私有化的一些失败教训，就反推国有企业的成功或普遍存在的合理性，否则就是陷入逻辑悖论。而恰恰说明有些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来自于其他因素。

其次，私有化更多地表现出成功的经验。无论是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均表现出成功的经验。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民经济中渗透了私有化因素。从中国国内来看，愈是私有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愈发达；反之，经济愈不发达。对此，谁也无法否认。至于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虽曾有一些失败教训，但很多国家已经走出“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复苏，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如前所述，私有化虽有一些失败教训，但很多情况下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来自于其他因素，比如政府决策、私有化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失败教训恰是源

于过去国有化比重过高所留下的后遗症，在私有化过程中显露出来，从而成为私有化过程所应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在国企改革方面，有时候渐进式改革虽然没有激进式改革表现出明显的失败教训，但可能因此在某些方面给未来发展留下更大的隐患。中国对此应当引起重视。

再次，就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来看，有些人认为这是私有化的恶果。其实，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规律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的稍加疏忽或漏洞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场金融危机必然波及全球，而对于朝鲜等这类封闭型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朝鲜等国的国有经济就好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私有经济。中国的现实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大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相对落后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影响有限。但能否因此就断言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好于私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规律的表现，但谁也无法否定以私有企业为主导或私有企业较多的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和发展性。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后来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

因此，如果因私有化的一些失败教训或此次金融危机等，就简单地肯定、否定或对立公有制和私有制未免过分仓促与草率。而且，私有化成功与否仅是衡量与评价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一个标准，在其背后，还涉及到制度价值，包括但不限于民主、法治和人权等。这些岂非用私有化成功与否来简单衡量私有制和公有制？

## 二、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效率（效益）？

A 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国有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提高。事实证明，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论断完全是站不住脚的”。B 文认为，“国有企业能够实现高效率。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过时的”等。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之所以世界各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掀起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因为中国或新加坡等有些国家部分国有企业效益好，就推论国有企业效益都好，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国有企业整体效率低下的不争事实；也不能因为私有化的一些失败教训，就反推国有经济效率高。

其次，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国有经济从来不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来自国有经济，而是来自私有经济。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曾掀起过国有化运动，比如法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在近 60 年的时间里进行过 3 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英国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79 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大规模私有化之前，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等，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该国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 1974 至 1979 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 1990 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而国有化比重如此之低；而在国有化比重如此低的情况下，依然掀起了私有化运动，就足以验证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谁的贡献愈大？即使新加坡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也没有超过私有经济，更何况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尚不具有普遍性。再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来看，当国家持有的资本比例通过私有化而下降时，企业的效率就不断地提高。事实证明，即使在公私混营企业中，只有国家在其中持有 10%--30% 的资本比例，而企业经营管理大权由私人担当，这样的企业经济效率才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再次，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来看，该类国家在建国初期表现出的较高发展速度，往往与计划经济体制初期合理性因素的发挥、历史上朝代更替初期“太平盛世”的历史轨迹以及战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时期领袖魅力等因素有关。但这种现象仅是暂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导致经济发展滞后，而不是某些人别有用心地认为是私有化造成的。至于这些国家私有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失败教训，乃是长期以来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所留下的后遗症，或是私有化措施和方法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责任归咎于私有化，更不可低估这些国家发展的后劲。此外，对于仍抱以国有经济为绝对主导的朝鲜和古巴等极少数国家而言，现实已不言自明。如果这类国家仍不思变革，最终将重蹈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

又次，从中国来看，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等固有弊端已是不争事实，这也是中国之所以改革开放及其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 500 亿元；而进入 90 年代，每年至少流失 800—1000 亿元。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 年至 2007 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 8.53 万亿元增长到 18 万亿元，年均增长 16.1%；实现利润从 3786 亿元增长到 16200 亿元，年均增长 33.7%。2007 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 1.77 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34.5%。也有学者认为，2009 年公布的中国 2008 年 500 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8.2 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 83%；实现利润总额为 1.2 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 86.6%。但是，总体而言，我国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往往不是来自纯粹的国有企业，而多来自国有控股企业，其经济效益的改善更多地不是取决于“国有”成分，而是得益于“私有”成分的渗透和行政垄断因素。即使纯粹的国有企业，其经济利润更是来自行政垄断因素。严格而言，我国国有企业如果

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再除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外，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可言。更何况国有企业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总之，国有垄断利润往往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是如此。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 三、如何看待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兼容关系？

A 文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

B 文认为，“国有企业不能与市场机制兼容的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过时的”等。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及其国有经济，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国有企业或公有制当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竞争经济，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就竞争领域而言，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缺乏兼容或兼容不足。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也正如 B 文所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相互促进中谋求双方共赢，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幽灵无时不在，其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

1、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身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法律和道德在人性的驱动下，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往往假借“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是具有相对意义。相比较出资人模糊不清而言要进步许多，但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全民”的代议机构人大应有地位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同时，在国资委名义下的各类国有企业在公权力的干预下变相地关联交易时有发生，其独立性备受质疑。因此，A 文所认为的“这些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自主的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权、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区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对于 B 文所提及的国有企业如同私有企业也可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治理的搭便车问题”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2、国有企业存在行政垄断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

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魔掌”。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A文认为“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私有企业也存在着垄断现象，而且正如A文所言“在当今世界，私有企业的垄断要比国有企业的垄断多得多”。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私有企业的垄断要比国有企业的垄断多得多”的国家恰是私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而国有企业本身就很少，而这些恰恰允许私有企业大量存在、却依然成为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必然有其合理性。反之，国有企业的垄断要远远高于私有企业的垄断恰是在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这就不难理解长期以来为何中国、苏联东欧等国家行政垄断现象如此严重。

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与行政权力牵连，有着行政垄断倾向。因此，如果从企业数量绝对比例来看，无论私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还是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国有企业的垄断要远远高于私有企业的垄断。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的垄断存在着制度设计的天然不合理性，而私有企业的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有其经济规律性。进而言之，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与行政权力的天然牵连，故法律规制更难，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在以国有企业垄断为主导的国家恰是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或地区，导致反国有垄断难上加难。而私有企业的垄断往往通过法律能够有效地加以规制，尤其在以私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其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也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说，我们更应当“大加鞭挞、横加指责国有企业的垄断”。

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多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的因素，再加以法律难以有效规制，故国有垄断利润就是一种与民争利的结果。而这种与民争利的结果，本身就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从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就是典型例证。再从B文来看，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垄断身份，“更容易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而不是单纯基于银行对企业规模的偏爱。如果商业银行基于对企业规模的偏爱而产生信贷支持，完全符合市场规律。但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规模更多地不是来自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来自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行政垄断规模加以行政权力的阴影所形成的不合理信贷支持不但延缓或阻碍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商业化改革，而且还进一步“挤压了私人企业的生存空间”。

至于B文所言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明确了国有资产的监管主体，改变了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政企不分、政资合一的局面”，很显然是一种盲目乐观、只看“标”而不看“本”的一种观点，依然没有走出“国家所有权的神话”。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发达国家国有财产出资人既可以是专设机构，也可以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或授权经营公司等，因为这些均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国家有着准确的国有财产市场定位及其较高的民主法治化水平。而在我国，由于国有财产市场定位尚未完全到位，以及缺

乏较高的法治化水平，在此前提下，无论如何谈论国有财产的出资人、国资监管、国企治理等，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包括《企业国有资产法》在内的诸多法律法规难见成效。

#### **四、国有企业的市场定位：“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在市场经济社会，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或许有人从效率的角度加以抵制，但效率损失的背后更多地体现决策的科学性及其长远利益；即使所谓的“效率损失”也是民主法治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任何制度的构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

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则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比如在 1929 年至 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这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的幽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比如英国在 1974 至 1979 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 1990 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全面国有化已经证明失败了。

从中国来看，虽然 1979 年到 2009 年，国有经济比重由 90% 以上降低到 1/3 左右，但仍达到 1/3，

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而且，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331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66%。由此可见，我国国有企业虽然经历了多次改革，但尚未彻底实现市场转型，国企改革在市场竞争领域依然是“国退民进”、“还权于民”的方向。但“国退民进”绝非一概否定公有制，对于非竞争性领域、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等，国家依然保持控制力；对于诸多金融危机等经济危机或战争等特定因素破坏市场机制时，国家也会必要地介入经济领域。这些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于中国而言，除了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外，还要考虑到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基于产业政策需要等因素，国家一定程度地会介入部分竞争性产业，以起到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但这具有暂时性、阶段性和周期性，而非长期的。

## 五、尚未了结的话题

公有制和私有制本是经济学概念，既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褒义词，而是中性概念；两者也不是对立命题，均为经济发展的选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中提到，“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sup>20</sup> 当今社会公司法人所有权即是典型例证。马克思也曾经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他也曾把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设计比喻为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随着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当今世界出现了所有权社会化趋势。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社会化企业，已非传统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所涵盖，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所有制，即公司法人所有权。它在很大程度上既克服了传统私有制的缺陷，也解决了传统公有制的困惑。对此，列宁在特定时期也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司的社会化企业特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在列宁看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开始从私人生产让位于社会化的生产。不管他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至少认为他们均认识到了公司的社会化企业特性及其意义以及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以今天的市场经济眼光来衡量，这恰是传统私有制和公有制所无法完全涵盖的。

然而，纵观世界历史，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把经济学意义上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赋予政治意识形态意义，教条式地曲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以“有色眼镜”看待私有制，从而使其发生绝对分野和对抗。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有企业不同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路径，不仅表现为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治理存在着更多的政治干预与计划经济的色彩，因而暴露出更多国有企业诟病，包括但不限于“滥用全民名义”、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经营效益低下、“官商结合”带来的权力寻租和损公肥私而产生的贫富差距的异化以及“权贵资

本”等。

这一点在 A 文和 B 文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 A 文还是 B 文均先入为主地把公有制与社会制度挂钩，并以其优越性为前提，再来看待私有制，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偏见，同时也陷入了逻辑悖论。比如 A 文认为“如果生产资料被私有化了，被少数私人和私有利益集团的垄断占有了，那么，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民主，而只能形成垄断资本占主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姑且不论此话正确与否，依此逻辑推理：就好像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化水平很高一样；也似乎今日的朝鲜等国社会主义民主化水平很高一样；就好像国有企业利润均惠及于民一样，殊不知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也有可能流入少数私人和私有利益集团手中，而且这种“盗用人民名义”且在无制约下的国有财产流失更为可怕！尤其在法治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如果说 A 文和 B 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公有制或国有制存在着一种“制度偏见”，“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么，A 文和 B 文把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词汇“公有制”和“私有制”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视“私有制”或“私有企业”为敏感话题，同样也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也就不难理解无论张宇的文章还是张晨的文章为何通篇很少提及“私有企业”词汇，而以“民营企业”代替，从而产生诸多自找麻烦的所谓中国特色的概念。

“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国情进行经济发展的选项而已。但如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加以政治意识形态化，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则才是可怕的！因为很容易以政治的眼光非理性地看待经济问题。历史的教训让我们触目惊心！或许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财产管理有所启发。■

[【返回目录】](#)

## 李照兴:《流浪地球》从中美贸易战看国产科幻片 背后讯息应如何解读?

[ 李照兴 现代传媒集团创意总监, 主力负责《城市画报》城市版。香港文化评论人、导演、作家, 现居上海及北京。本文节录自 2019 年 2 月 18 日第 150 期《香港 01》周报《从〈流浪地球〉大热说起「中国科幻元年」真的到来了? 》 ]



本文作者李照兴

以《流浪地球》这部电影的水平能表明中国电影已正式进入「科幻元年」吗? 在承先启后及树立起点的作用上, 客观地说, 《流浪地球》起码是做到了为科幻电影元年立碑的角色。《纽约时报》的评价是, 「在太空探索领域, 中国人是后来者, 科幻电影方面同样如此,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中国第一部科幻大制作《流浪地球》显露端倪, 代表中国电影进入崭新纪元。」起码足以把它放进世界电影发展地图上。不要忘记, 今年还有像《上海堡垒》、《明日战记》和《拓星者》等多部中国科幻电影轮番登场。

### 国产科幻创作简史

这些后来者可能引发的中国科幻电影潮, 都只是表象, 更重要是建立产业。原著作者刘慈欣无疑是《流浪地球》的最大卖点之一, 他近年在国内外科幻文学界声名鹊起, 使人们对中国科幻作品有了广泛的关注。值得期待的科幻电影作品, 还有刘慈欣早期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和郝景芳的中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自晚清的跟风创作到带中国特色的科幻, 这条创作路历经逾百年。

1902 年, 幻想科幻救国的梁启超将法国作家兼天文学家佛琳玛利安 (Camille Flammarion) 的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文原名: 《La Fin du Monde》) 和凡尔纳 (Jules Verne) 的《两年假期》

(法文原名：《Deux ans de vacances》) 由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并向国内读者推介。此后鲁迅接过这项使命，先后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北极探险记》等西方科幻作品。在 1949 年之后，中国推崇前苏联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学，科幻创作一度停滞，直到「文革」结束。



原著作者刘慈欣(右)认为，写小说是面对科幻读者，拍电影却是面对一般观众，内容上的修改在所难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幻文学迎来短暂的春天，享有「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称誉的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相继问世；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更在 1980 年被改编为内地第一部科幻电影——在中国当代科幻作家韩松看来，以小说而言，「中国科幻元年」即 1980 年，他认为：「《珊瑚岛上的死光》是一部标志性作品，各方面符合我们想象中的科幻概念：奇观、科幻的核心技术元素、想象力和情节冲突」。

从翻译到原创，从文本到电影，现在处于路前端的《流浪地球》及往后来者，都可说是历史的受益者。但必须强调，移植的幻想并不代表自有，要逐步拓展中国式异想和奇观世界（文学评论界曾把古代志怪小说，如穿越剧情作为中式科幻先驱作讨论），当然不能只依靠煽情与感性。

### 所有人都说要打造 IP

在科幻创作的新时代转型下，刘慈欣可说成为当今中国科幻创作的最大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创造者，他还合伙共同研发科幻作品及版权合作的产业，目的是鼓励更多作品，并有系统地发展成小说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除了大 IP 的影响力，《流浪地球》这部中国科幻电影「票王」，也依赖资本推动。它有一亿多资金来自投资公司「北京文化」，该公司前身为国有企业，依托的是旅游经

济，此后转向影视行业，自然是因为看到了业界巨大的前景和利润。



《珊瑚岛上的死光》堪称为内地第一部科幻电影

近年来，由于创业市场疲软，在严打税收前，国内众多投资人开始将目光瞄准影视行业。围绕大IP创作则是最常见的出品模式，例如与《流浪地球》同期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这种影视投资模式参照佐治鲁卡斯创建的光影魔幻公司（Industrial Light & Magic，简称ILM），以及推出星球大战系列和漫威英雄系列的博伟影视公司（Buena Vista Home Entertainment）。看来这些深层次的结构运营，才是真正从外到内不能缺失的基础。



《流浪地球》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电影将正式走入「科幻元年」？

或许这些荷里活顶级公司为中国投资者带来的不止是参照楷模，还有数十年来培养出的科幻电影

观众群——这群体不乏 80 后和 90 后，受西方科幻文化影响，对于本土科幻作品有着和球迷一样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对本土创作失望，另一方面又渴望惊喜。



围绕 IP 创作是内地电影业界常见的出品模式，与《流浪地球》同期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正是一例

《流浪地球》问世后，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价，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心态的极端投射。拥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和足够庞大的市场支撑，中国影视产业才渐成规模，并鼓足胆量迈进全新领域。



电影《2001 太空漫游》剧照

太空电影意味着软实力博弈，冷战时期前苏联推出《星球梭那里斯》回应《2001 太空漫游》

相对于其他类型，科幻电影堪称难度高，涉及原创文学、编剧、表演、视觉特效等诸多产业链支撑。以此全面考量，中国推出一部成熟的科幻电影，实属困难。去年影视业曝光的阴阳合同、天价片

酬和流量吸金等丑闻，使得广电总局颁布更严厉的监管政策，业界更雪上加霜。不过，当某种名义上升到国家高度，自然获得更雄厚的支持。因为太空电影本身意味着文化层面的国力、资本和软实力的综合博弈，这就是为何冷战时期，前苏联不遗余力推出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内地译《飞向太空》），以回应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因此，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去看《流浪地球》，又多了一个宏大的解读维度。中共十七大报告写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强调中国文化以新的姿态和形式走向世界，并形成自己的产品体系。继动作片后，科幻片无疑是一个崭新、绝佳的流行突破口。尽管《流浪地球》有联合政府，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精诚合作才会赢得生机，但其核心仍是表达中国式价值观。影片在大背景中隶属于国策复兴文化的一部分，客观而言，亦反映中国希望参与国际事务，并渴望走在前沿。

在资本、市场、政策，乃至人民情绪的支持下，以量而言，这几年国产科幻电影必会迎来集体大爆发，风险就如当年流行古装军甲电影。如果一窝蜂出现，反而引致审美疲劳。长路漫漫，真正成熟佳作得经过沉淀。正如对刘慈欣影响深远的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所言：「我从来没有长大，但从来没有停止成长」。 🍷

[【返回目录】](#)

## 弗马：对《流浪地球》的哲学批判：哲学能为中国科幻的发展做些什么？

[ 本文首发于 2019-2-7 哲学治疗 ]

### 题 记

哲学缺位，是中国科幻电影的硬伤；无疑，《流浪地球》使得中国科幻电影进入了“硬科幻时代”，但同时也使得中国科幻电影产业沦为好莱坞模式的下家；中国科幻要进入“硬科幻”与“软科幻”有机结合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科幻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弗马

### 内容提要

1. 在《流浪地球》中，没有哲学的位置。
2. 《流浪地球》坚持“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关于什么是“最大幸福”将是受争议的。
3. 流浪地球计划的实施，需要诉诸于一个强有力的极权政府，但是小说和电影的前提“人类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却与此相悖；《流浪地球》的集体主义预设，自相矛盾。
4. 《流浪地球》坚持了一种“庸俗人类中心主义”原则，这在逻辑上不可行，在操作上不可做，在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上来看缺乏根基，其思维方式太过简单、太过陈旧、太过机械。
5. 总体看来，《流浪地球》所坚持的“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和“庸俗人类中心主义”，具有“简单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一句粗俗的话说，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奶就是娘”、“给口吃的就能活”。



6. 如果让我现在给《流浪地球》写个一句话影评，我只能说：“比好莱坞大片强了好几天”。
7. 《流浪地球》的成功，不过是好莱坞模式在中国的复制，不过是好莱坞模式的“下家”；这也

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

8. 哲学，尤其是科技哲学，应该参与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同时，中国科幻电影产业如果想要取得实质性地发展，实现弯道超车，也应该主动与科技哲学界联姻。

### 一、《流浪地球》的哲学缺位

待激情褪去，只剩下略显残忍的理性思考，哲学的批判精神再次占据了 my 的头脑，看过《流浪地球》已有几天，有一个疑问逐渐占据了 my 的脑海：在《流浪地球》中，哲学的位置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查阅了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小说原著，里面用一段话做了交待：

**“学校教育都集中在理工科上，艺术和哲学之类的教育已压缩到最少，人类没有这份闲心了。这是人类最忙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很有意思的是，地球上所有的宗教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现在终于明白，就算真有上帝，他也是个王八蛋。历史课还是有的，只是课本中前太阳时代的人类历史对我们就像伊甸园中的神话一样”。**

答案是很明显的，在《流浪地球》中，没有哲学的位置；这包括：在小说《流浪地球》的写作过程中，没有哲学的指导；在小说《流浪地球》的故事情节里，没有哲学的启迪；在电影《流浪地球》的拍摄过程中，没有哲学的参与；在电影《流浪地球》的镜头和故事线中，也没有哲学的出场、复线或启示。

我在之前的《给外星人讲哲学》系列文章中，已经做过论述：科技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离不开哲学的推动；同时，科技的大发展，也会催生出更符合时代需要的哲学；并且，将理性的触角延伸到宇宙领域，也是三百多年以来德国哲学家们的一贯作风。

遗憾的是，中国首部硬科幻，不仅丝毫没有哲学的位置，甚至在其原著中还饱含了对哲学、宗教和艺术等人文学科的鄙夷，被斥为“操闲心”的人才做的事情；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理工科学生的观点。然而，哲学真的如此没用吗？少了哲学，中国科幻产业真地能走很远吗？哲学是否能够为中国科幻的发展做些什么？

因此，我不得不写点什么；一是，为了帮助关注本公众号的思考者们，在过完春节之后，能够再次进入澄明之境；二是，为了以后应对学生们的提问，并启迪他们进行哲学思考；三是，通过写作来自我批判、自我提升，是我的一个习惯，即使没人读、没人赞、没人转发、没人打赏，我也照样会继续写下去的。

### 二、《流浪地球》的价值论预设及其哲学批判

关于《流浪地球》的价值预设，早已有博文做了详细阐述，中国观众们也都默认了这些观点：带着地球去流浪，展现出中国文化独有的乡土情结；全球各国救援队出场，展现出集体主义精神；保存

人类种族为第一要务，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价值预设”与“价值论预设”是两回事，“价值论”是经过论证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价值观”都能够上升到“价值论”层面，也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论的指导；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一个成功的机构、一部能够在史上留名的电影，却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论；带着这种要求，我们可以将《流浪地球》的价值论，归结为“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三种价值论，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彼此镶嵌、相互论证，但是在哲学上却是广受争议的。

### **1. 功利主义及其批判**

首先，《流浪地球》彻底坚持了功利主义原则，即人类社会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面临地球即将被太阳吞没这个灾难，“最大幸福”是使得人类种族存活下去，为此，全人类都必须做出选择，“享受最后的余生”这一方案是不被允许的；面临地球派和飞船派的冲突，“最大幸福”是保全地球一半的人口，为此，人们可以理性地让抽签选择自己的命运，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地球一半的人口被洪水淹没；在实施流浪地球计划的过程中，“最大幸福”是活着，为此，人们可以在地下城心惊胆战地生活 2500 年，人们可以像奴隶、机械一样喂养着地球发动机，可以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没有生育、没有美食、没有艺术、没有信仰、没有哲学、没有宗教。

这样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就是所谓的“最大幸福”吗？如果是你，你愿意用一辈子暗无天日的奴役生活，去换取“活着”这个所谓的“最大幸福”吗？

### **2. 集体主义及其批判**

其次，《流浪地球》彻底贯彻了集体主义精神，即，个体要服从于集体的安排。

流浪地球计划，是由某个强有力的组织“联合政府”做出的决策，个人是渺小的，不能投票，不能弃权。在小说中，在太阳氦闪之前，联合政府被一些反叛军推翻了；这个情节，也将联合政府展现为彻底的极权主义形式。如果联合政府的官员，是由全人类的每一个体投票选出的，并且选举规则、选举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为什么还会有反叛军出现，为什么要推翻它？——可以看出，刘慈欣心目中的政府形象，默认了就是极权主义的，其统治方式也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这的确是“集体主义”的典型体现，“集体”被视为高于个体的独立存在，它能够发挥独特的影响力。

根据一些文章，我了解到，在拍摄《流浪地球》之前，导演郭帆曾写过一个地球时间表，说美国曾退出流浪地球计划，选择实施飞船派逃亡计划，但是最终也因为只能满足少部分富豪的需求，而被民众推翻。这个推演，我认为也太过简单。美国的政府，是由每一个美国民众选出来的，是要服务于每一个体的，你如果对它不满意，你可以不选它，你甚至可以竞选当总统，你有必要用暴力推翻它吗？如果个别富豪有能力自建飞船，率先逃离，为什么不被允许？在个体主义盛行的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其他个人也没有权力，去干涉一些个体做出逃亡的行为。为什么必须要在飞船派和地球派中二选一？为什么在实施流浪地球计划的时候，不能允许一部分人驾船逃离？多一些备选方案，不是更能

保全人类种族吗？归根到底，飞船派和地球派，都是默认了“集体主义”这个原则，它消解了个体的选择可能性。

客观地讲，流浪地球计划，如此宏伟、浩瀚、漫长、复杂、巨大，的确需要一个独裁式的、强有力的极权政府，否则难以实施。然而，在当前多元化的、民主化的世界浪潮之中，即使地球真正出现被太阳吞没的危机，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种世界性的极权政府；除非有某一个极权国家统治了全世界，然后迫使全世界的人都实施流浪地球计划；这并不是不可能，然而遗憾的是，刘慈欣和郭帆都没有做好交待，也没有进行过论证。

我认为，更合理的推理是：像美国、英国等个体主义国家，会允许一部分人先驾船离开，成为探路者；即使实施流浪地球计划，也要让人们自愿选择是否进地下城，如果人数太多，再抽签决定，但是进入地下城的条件是，你要无条件地遵守《流浪地球法案》，完全地服务于喂养地球发动机这项奴役性的任务，这体现为契约精神；此外，还要允许一部分人放弃逃亡、享受余生，在刹车时代自然死亡，或许对他们来说，活着并不是最大幸福，有尊严地活着才是。

### 3. 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批判

第三，《流浪地球》彻底坚持了“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原则，即，除人以外的一切事物，均可以被人类自然而然地使用。

弗马博士在看过电影之后，最先产生的疑问就是：动植物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在小说中没有交待；电影倒是别出心裁地给予了几个镜头。电影中只出现过三种动物：1. 忙忙碌碌的人；2. 被制做成“蚯蚓干”的蚯蚓；3. 被冻成冰柱的抹香鲸。电影中只出现过一种植物：倒挂在地下城天花板上的大树。

并不会在价值论上反驳人类中心主义，我是从方法论、生存论、可行性上进行反驳。人类是漫长进化的产物，长期以来，人类已经与地球上的动物、植物、细菌、病毒达成了一种和谐。每个成年人，携带着 1kg 的细菌，没有了这些生命体的干扰，人类的免疫系统将得不到训练，人类在地下城不会超过两代人，就会被各种传染病、流行病消灭掉。没有了植物、海洋藻类，地球的大气生态将会被完全破坏掉，仅靠人工制氧能坚持 2500 年吗？没有了动物的陪伴，人类将会被各种抑郁症、孤独症所折磨，自杀事件、反社会事件、暴力事件将会层出不穷。人毕竟不是机械，不像机器人那样，只靠电就够了。人所需要的，比你想象的还多得多。

其次，我在旧文《我为基因编辑技术唱赞歌》中已经做过论证，“人类”其实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抽象名词，是对真正存在的每一个体的统称，先有了人，才有了人类。当我们要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首先具体地考虑单个人的困惑、解决单个人的问题，然后“人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此观之，《流浪地球》中冠冕堂皇的以“保全人类种族”为“最大幸福”的方案，其实是一场虚无。

为什么如此说呢？我们推理一下。“保全人类种族”的意识，对于某个人来说，便是“传宗接代”意识；在文化上体现为《周易》中的“生生不息”，体现为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随着城市化浪潮、工业化浪潮的推进，这些传统的“集体意识”正在遭到消解；“不生孩子”是中产阶级的一个趋势，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要出台政策鼓励中产阶级生孩子。为什么呢？难道他不想让自己的“血脉”得到传播吗？这可是所有动物最本能的需求啊！

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的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对原始欲望、原始本能的压制和抵制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文明竟然真正做到了，让人们克制住自己的这种原始本能。如果一个人，连孩子都不生，你让他将“保全人类种族”为“做大幸福”，可能吗？我连孩子都没有，我的基因肯定得不到传播，我就想开开心心地和伴侣过好二人世界，你人类如果灭亡了，与我有何关系吗？凭什么让我们没有孩子的，为了你们繁衍后代、传宗接代牺牲自己的幸福生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让有孩子的、有孙子的去拯救地球吧，我们只想活到自然死亡！

有一些影评说，《流浪地球》展现出了“个人从属于集体”的“人观”或“人论”，在地球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没有任何个人能够脱离与集体的干系。这种论证思路，我太熟了，似乎中国著名四大名曲之一的《桃花扇》也是这么论述“家”与“国”的关系的：“你们这些痴男怨女，国都破了，哪来的家”？



是的，在一个蚂蚁组织式的、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国家，集体的网络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和个体之中，如果蚁后死了，所有的工蚁、兵蚁都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电影《白鹿原》中第一个

镜头就是，鹿子霖去交皇粮，回到原上，跟白嘉轩哭诉：“稼轩啊，皇上没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没地儿交皇粮了！”但是，很遗憾，自由和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白鹿原》中的普通人物们照样过他们的日子，有的过得比有皇上的时候还更好。

我国坚持的市场经济也鼓励充分发挥个人的最大价值，试图调动全民参与一项事业，已经越来越难，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每当一个主流观点出来，总会有抨击者出现。就“拯救人类种族”这一宏伟事业来说，要调动全民参与，还真不简单；总而言之，在丁克文化盛行的今天，拯救人类并不是所有人喜欢做的梦。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违背了“个人才是集体的基本单元”这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



因此，我认为刘慈欣和郭帆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庸俗人类中心主义”，其思维方式太过简单、太过陈旧、太过机械。

## 小 结

总体看来，《流浪地球》所坚持的“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和“庸俗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简单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一句粗俗的话说，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奶就是娘”、“给口吃的就能活”。

很抱歉，我不得不说，《流浪地球》里没有鲜活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个人；但是如果没有了人性和文明，人类只会做出残忍和极端的事，不会做出“流浪地球”这样崇高的事业；除非这项事业本身是由某个极权政府推动实施的，这样的话，小说版《流浪地球》最后出现反叛联合政府的行为，也就合

理了；然而，这样的话，小说和电影中对“人类达到了空前团结”这种预设又显得不合理的。

总而言之，《流浪地球》缺乏价值论的指导，缺乏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 三、中国科幻产业将是好莱坞模式的“后殖民”吗？

我对《流浪地球》进行哲学批判，并不是不喜欢它，并不是不支持它，相反，正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太支持它了，所以我对它有深刻的反思和更高的期待，所以才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了这篇博文。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科幻电影都具备哲学的素养，《超人》《钢铁侠》《蝙蝠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电影，也无非是充满了对自由主义、个体主义、英雄主义等美国精神的宣扬。从我个人的观影体验来看，《流浪地球》已经超过了这些好莱坞大片。我想，我与小伙们的感受类似，每次看完好莱坞大片，当时很震撼，但是一走出电影院的大门，出门左拐吃个麦当劳的功夫，也就忘记了电影到底是讲啥了；工作照旧，生活照旧，快餐文化嘛，不过是给扮演螺丝钉的我们添加一些润滑油，好让工业机器转动得稳健一些，归根到底，好莱坞大片是工业化社会的盟友，娱乐不过是为了安稳的工作，润滑油、保养液也不过是为了机器的运转。与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看完《流浪地球》之后，我竟然兴奋了好几天；但是，现在的感受，已经与好莱坞大片没啥区别了，我甚至很困惑，我当初到底兴奋个啥？

如果让我现在给《流浪地球》写个一句话影评，我只能说：“比好莱坞大片强了好几天。”这个评价是我对《流浪地球》的赞誉；同时，也是我对《流浪地球》的苛责：《流浪地球》的成功，不过是好莱坞模式在中国的复制，不过是好莱坞模式的“下家”。同时，这也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当我们考察导演郭帆的经历，也似乎看出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命运：郭帆曾多次到美国学习，并被美国的科幻产业深深震撼，他在刻意模仿好莱坞模式。

所以，真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吗？是的，中国终于诞生了首部“硬科幻”，但是，这也有可能标志着，我们成功地被好莱坞模式锁定了：追求感官刺激、追求场面特效、追求票房排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中国是否出现“硬科幻”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都不过是进电影院进行一次感官享受而已，只不过那种从小被灌输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作祟，让我们带着“支持国货”的心情更欣赏国产科幻罢了。这对于中国科幻产业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它将会成为好莱坞模式的“后殖民”结果，这意味着，中国的电影资本将会争相模仿学习好莱坞模式，花高价向好莱坞引进人才、购买设备、购买技术，从而更加推动好莱坞的发展。到那个时候，中国科幻电影与好莱坞科幻电影将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是，后者只需通过向前者销售技术就能轻松赚钱；这就像，外国企业在中国办厂，中国人辛辛苦苦工作，大部分钱都交了专利费。这是典型的后殖民文化和后殖民结果，类似于东印度公司向清政府销售鸦片。

因此，这真不是我想看到的中国科幻电影产业的结果；我期待，有一天，中国科幻不只是好莱坞模式的“硬科幻”，还要拥有哲学的深层次思考，具备一些“软科幻”的元素，最终实现“硬科幻”与“软科幻”有机结合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科幻电影”。

## 结 语

我曾借助《黑客帝国》，给学生讲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曾借助《星际穿越》，给学生讲解黑洞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我曾借助《黑镜》系列，给学生讲解人工智能的危机；在将来，我能够借助《流浪地球》，给学生讲解什么哲学原理？——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期待中国能够多出一些具有哲学思考的科幻作品和科幻电影。

毫无疑问的是，哲学，尤其是科技哲学，应该参与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同时，中国科幻电影产业如果想要取得实质性地发展，实现弯道超车，也应该主动与科技哲学界联姻。 🍷

弗马 写于 2019 年 2 月 6 日-13 日

[【返回目录】](#)

## 陶东风：拒绝有技术的野蛮人 | 开学伊始谈什么是大学精神

[陶东风 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民主与科学》2013 年第 5 期]



本文作者陶东风教授

大学新学期开始了，新生入学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高兴甚至欢心鼓舞的时刻，但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和复杂：因为今天是一个价值观，包括大学的价值观、大学生的价值观乃至教授的价值观空前混乱的时代，也是大学精神陷入空前危机的时代。唯权是图，唯利是图，实用主义，投机犬儒等等现象，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大学校园都非常流行。就在前年，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微博上就对自己的学生扬言：“到 40 岁还没有挣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谈谈一个老话题：到底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

大学，英文为 university，和它相关的两个词分别为 universe 和 universal，前者意为宇宙，后者意为普遍的、普世的。这几个相互关联的词为我们理解大学精神提供了线索。

首先，大学秉持的是普世价值而不是特殊价值，它追求的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不是特定群体（不管它是民族、阶级，还是其他团体）的特殊利益，它为全社会服务而不是为特定人群服务；其次，大学精神超越了不同专业和学科，它是不同的专业和学科都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治学态度，它是通过传授普遍知识而不是专业知识而获得的。它培养的是有教养的公民，是头脑理性，言谈优雅、举止得体的“绅士”，而不是目光短浅、惟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有技术没文化的新野蛮人。因此，大学教育应该特别重视通识教育、人文教育。

大学之“大”就体现在这个普遍性的追求上。大学文化是普世主义的文化。

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秉持独立、自由的立场。借用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上的两句话，大学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说大学是一个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地方。思想无禁区，我们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此地不得思考”；“独立之精神”是说大学必须具有独立品格，有独立于权力和金钱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离的自主世界（虽然它仍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感应着外在世界的风云变幻）。权力和金钱被大学的尊严拒之门外。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斯蒂安·卡尔·费迪南·冯·洪堡**

[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9.14—1859.5.6]

德国政治家、外交家、教育改革家，德国文化史上影响最深刻学者之一，

时任普鲁士王国的教育大臣，

1810年创办的欧洲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现今仍属世界顶级学府

德国现代大学之父洪堡创办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认为大学必须研究纯粹之学术，必须独立于政府：“谓高等学术机构，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与任何政府机构无关”，“政府不可把大学视为文科中学，或是专门学院，也不能把科学院当成国家所属的技术或科学机构来对待。就总体而言，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更高的层次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种种举措所能企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洪堡看来，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把大学当做自己的附属机构，否则不但破坏了大学的自治原则，而且无法让大学最终发挥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目的。纳粹德国时期的政府和大学的

扭曲关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大学不但独立于权力，而且还要独立于金钱。英国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翻译为“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的著名倡导者、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论自由教育》中指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知识有其自身的目的”。他坚决反对把知识用于经济利益或廉价的道德教育，他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成为绅士是件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魂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是好事——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领。”通过自由教育，“理智不是用来造就或屈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是，某种具体的行业或职业，抑或是学科或科学，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进行训练，为了对其自身固有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养”。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2.15—1947.12.30]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任教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其所创立的过程哲学、形而上学体系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形而上学理论，他对传统中国哲学亦有研究，曾说：“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了解详情，去读孔子”

拒绝廉价的道德教育并不意味着大学教育没有道德和价值维度。大学里的道德教育应该是公民道德教育。在蔡元培先生著名的“五育并举”说中，公民道德教育占有突出的位置。蔡元培认为，军国

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使人明辨是非，站在全人类的公正立场批判一切非正义。

大学的普遍性、自由性、独立性和非功利性，与它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从根本上讲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大学的恰当作用是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去掌握知识”，“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用代代相传的火炬象征知识，那个光明的火炬就是我所说的想象力。组织建设一所大学的全部艺术就是拥有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的学术知识为想象之光所照亮。”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

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常常做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黯淡下来。”现在我们也讲中国梦，如果中国梦就是发财梦和做官梦，那么，中国肯定没有希望。

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虽然主张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反对贵族政治和贵族教育，但他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心仪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绅士教育，特别是其非功利的纯学术传统，认为这个传统应该在民主社会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原先“局限于悠闲绅士”的那种高雅乐趣，应该被大众分享。他提出了“有文化的民主政体”的目标：民主国家的大众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而应该是有文化的绅士。罗素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我不希望诗人、画家、作曲家或数学家一心想着他们的活动在应用领域的间接影响。他们不如去追求一种幻象，去努力捉住和永久地留住他们起初曾在瞬间隐约看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爱得如痴如狂，相比之下，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变得黯然失色。所有伟大的艺术和所有伟大的科学都源于这样一种热情，即人们要具体地表现出那种起初虚无缥缈的幻象，那种诱使人们舍弃安全和舒适而去光荣献身的奇美。凡怀

有这种情感的人绝不会受功利主义哲学的束缚，因为人若变得伟大，全凭这种热情。”

罗素有一篇文章就叫《“无用的”知识》。他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罗素认为，学习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在今天“把语言看做具有美学价值的概念正在泯灭”。“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

大学的普世主义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罗素更谈到了普遍主义的人文教育在当今世界的特殊意义：“现今的世界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文明毁灭，而不愿做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毒良方”。“需要的不是这样那样的特殊的、片段的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个人生概念的知识，艺术和历史。”可见，人文学院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目睹了二次大战悲剧的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在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危险性。他问道：现代科学技术节约了劳动、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可是“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正确地去使用它们”，“正确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合乎人道地”。“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带给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我们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的时间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可怜的收入。”爱因斯坦因此呼吁科学技术要具有价值维度：“如果你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爱因斯坦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他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上面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家关于普遍主义的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我们还可以参照德

国的例子，看看一旦背叛这种教育原则，后果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知道，洪堡创立的现代德国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突出强调自由和独立，但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性的大学”。大学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不但要参加军事训练，而且被灌输纳粹的世界观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德意志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暴力和仇恨。教授的政治可靠性是由党的官员确认的，教授的资格是教育部授予的，大学教师因为政治和种族原因被解雇的在当时达到15-20%之多。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教训极为深刻。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学也遭遇了类似的劫难：鼓吹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几乎全中国都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学生打老师事件，不但造成一代人学业的荒废，更使得人性和人际关系被严重扭曲，流毒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除。我们的教训同样深刻。



**罗伯特·赫钦斯**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1977]

美国著名的教育改革领袖和思想家，20世纪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29岁时出任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五任校长；其代表作有  
54卷的《西方世界名著丛书》、《美国高等教育》、《为自由的教育》、《学习型社会》等

立足于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人文教育，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或“博雅教育”“自由教育”。这种教育强调这种教育的普遍性、超专业性：通过普遍性的知识，来培养普遍人性、普遍修养，使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绅士。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认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其主要的方法是通

过阅读“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使我们从庸俗中解放出来”。“自由教育就是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自由教育是在民主大众社会里建立高贵气质的必要努力”。“作为对完美的高贵气质和对人的优异的培育，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雅和卓越”。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在他的《通识教育》（又译作“普通教育”）中对通识教育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首先，关于通识教育的意义，他写道：“如果没有通识教育，我们决不能办好一个大学。”因为通识教育是把大学里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人联系在一起，一种“共同的理智训练”“共同的观念基础”是大学这个学术文化共同体的联系纽带。

其次，关于这种通识教育的用处，他写道：“通识教育是对每一个人的教育，不论他是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如果他永远不上大学，它同样是有用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培养人的“理智的美德”，这种美德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当然，这种“有用”理论和我们当下流行的实用主义效用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实用主义着眼于眼前的直接效用，比如能否拿来赚钱，能否有助于升迁，是否有助于职业市场的竞争等等。但“理智的美德”作为一种长期熏陶而成的习惯，一种文化修养，实际上是大有用处的，它“能够在一切领域都起很好的作用”。

“如果理智是我们那样卓越的一部分，对它的培养又那样卓越，那么不仅它本身是美丽的，完美的，令人赞赏的以及高贵的，而且从真实的和高度的意义来说，对拥有这种理智的人们以及他周围的人，必定是有用的，不是在任何低下的、机械的、牟利的意义上显得有用，而是作为传播美好的事情，或者作为一次祝福，或一件礼物，一种权力，一宗财富，首先对拥有的人有用，然后通过他对这个世界有用”。“理智的培养对于一切社会的一切人都是同样的好事。”

第三，赫钦斯还认为这种“通识教育”是不变的、持久的：虽然世界瞬息万变，现实生活瞬息万变，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瞬息万变，但这种教育是不变的，它是“远离变化不定的现实”的，因为普世价值是有永恒性的，人性中有永恒的东西，人类对于真善美的基本标准是不变的，教育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绝对无条件地赶潮流和追时髦，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知识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因此，教育在任何地方应该是相同的。”真理和正义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如何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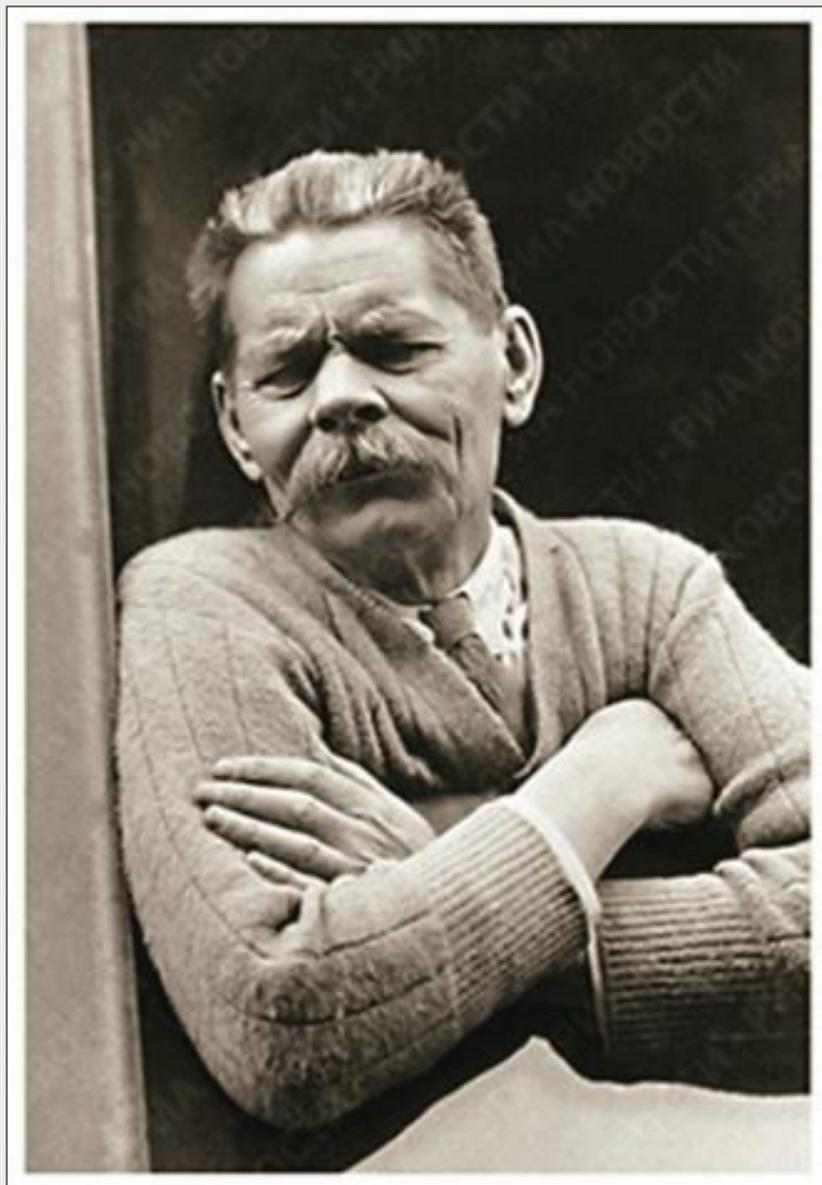
因此之故，普通教育就应该有不变的“永恒课程”，也就是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必须接受的那种教育。它不是可以赚钱立刻换来钱的技术知识，不是可以在职场竞争中立竿见影的那种知识，但是没有它你就只能是一个有技术的野蛮人。 ■

[【返回目录】](#)

## 狄马：高尔基说谎

[狄马 独立学者，编辑，作家。本文转载自 2004-10-10 爱思想]

上世纪 20 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众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 [1868.3.28–1936.6.18]

本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前苏联诗人、作家、评论家

1929 年 6 月 20 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

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遗憾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 14 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也泪流满面。

摒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来自真实的消息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这个 14 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的墙上。但在 1929 年 6 月 20 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说的真言维护了自己内心的安宁，高尔基却以墨写的谎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洁。



高尔基与罗曼罗兰 摄于 1935 年

6 年后，一个叫罗曼·罗兰的作家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记》的日记。但同时叮

嘱后人，他死之后 50 年才能出版。尽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大清洗现场的血腥细节：一个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不好，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向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这种公然的歧视感到不可理解，高尔基却反问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回答，“假如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

虽是这样，罗兰的亲苏态度还是遭到包括纪德在内的一大批杰出同行的非议，在这本书里，他替自己辩护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

这和高尔基的“牺牲少数”基本上是一思路。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长远牺牲当下，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昏话，岂不知离开具体个人的“苏联”，或别的什么，只是一个躺在字典里的名词。随后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政权背弃了土地，背弃了生活于其上的具体的个人，背弃了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权利和尊严，荣辱与梦想，一味追求什么“长远目标”、“根本利益”、“大局观念”，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代表的名词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不知长眠于法国墓园里的罗曼·罗兰，听到他不惜牺牲名节所维护的“苏联”不可挽救地崩溃后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罗曼·罗兰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返回目录】](#)

## 李炜光：中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缓慢转身

[李炜光 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读书》2012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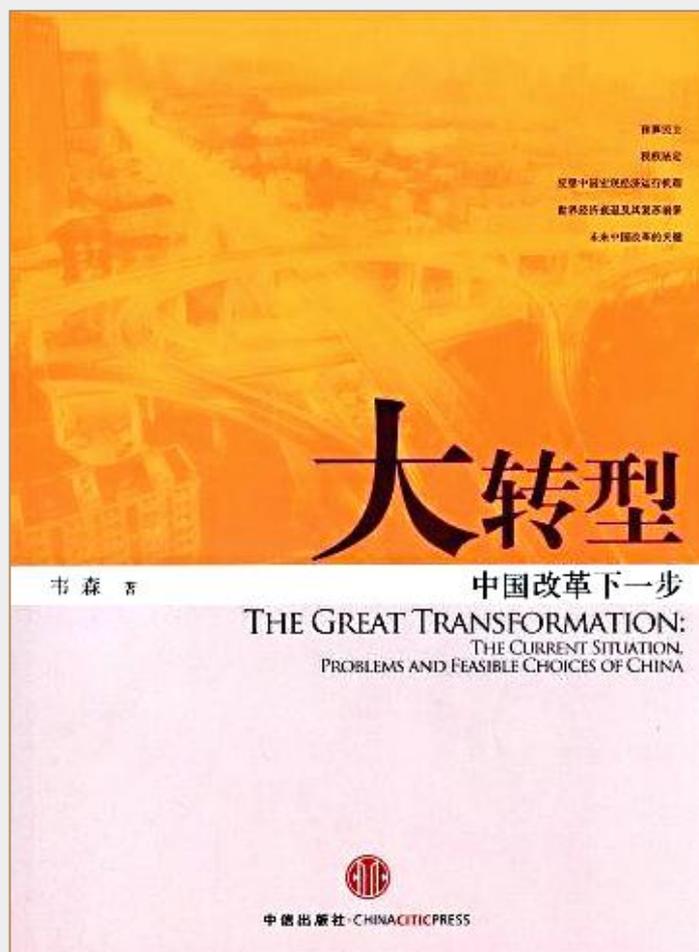


本文作者李炜光教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们一直习惯于将中国的制度变迁视为“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它远非经济问题所能概括，而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全方位的转型，或曰现代国家建构。这个过程从晚清洋务运动算起，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至今没有完成。如韦森教授在《大转型》序言中指出的：“如果我们把晚清以来中国人民为寻求富强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视作具有一定连续性的社会进程，那么，可以认为，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只是重新开启并加速了这个进程。”眼下中国转型陷入种种困顿纠结的情形表明，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化解这些冲突的最佳途径。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依然是一个跨世纪的“未完成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未来发展模式和路径重新审定的历史性命题。古老的中国仍在路上跋涉，没有安顿下来。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的集权化倾向。伴随权力扩张的，是基于政府官员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和层出不穷的“政绩工程”。这些耗费巨量纳税人钱财的工程项目与官员的个人私利密切相联。如果其行为不能被置于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之下，或者他们仍有能力罔顾来自民间的批评，这种彻底官僚化的权力运作体系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危害，将不亚于任何旧时代的政治腐败，这是“大转型”之所以艰难迂回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障碍和阻力主要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政府自身。韦森作为制度经济学家，敏锐地看到了中国转型的症结

所在，指出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似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未来中国向何处走，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大转型——中国改革的下一步》韦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 5 月出版

在本书的首篇时政论文中，韦森对近年来热议的“中国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之路，“这一点应该是全社会的共识”。但中国的市场化之路行走得并不顺畅，所以他随即指出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最大问题”，即政府在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它本身不但没有依市场的要求退出，而是愈加强势地参与其中，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最主要的、无处不在的市场主体，对经济高增长的偏好成为这个体系的内在逻辑。政府不仅指挥市场、驾驭市场、调控市场，还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和运作。在二〇〇八年以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刺激经济的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的干预之手几乎运用到了极致，成了全社会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然而，权力固然可促成一时繁荣，却需要比市场自发力量付出更多的代价。我同意韦森的判断，目前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某种混杂了计划经济残留物的怪异体制，它或许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在推动现代国家转型方面难有建树。所谓现代国家建构或转型，其“准星”还没有校正，走偏也就在所难免。



《大转型》作者韦森教授

古典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这种“政府推动型”的增长是难以持续的。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新创造价值多归于政府，结果只会是政府动员和汲取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民间得到的就越少，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财政刺激政策本应产生的“财政乘数效应”并未显现出来，带动私人部门投资消费也不十分明显，本来应该维持至少一个中等时段的增长效应，结果只过了两年左右就掉头向下，二〇一二年就不得不继续实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刺激政策。这样看来，经济学中所谓政府失灵，绝不只是简单的“政策失灵”，而是政府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功能出现系统性失灵。其更大的危害还在于，这个已然失灵的政府却还拥有巨大的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没有任何外部政治力量可以督促其在法治和民主的轨道上运行。这样的政府，注定会成为市场运行首当其冲的对手，与民争利，与市场争地盘，终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一次次社会转型的失败。

政府愈加膨胀的权力和职能范围，来源于其对社会财富的不断汲取。十几年前，曾有中国学者忧虑中国政府会因财富汲取能力较差而陷入困境，但无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国家理财史演变，还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新实践，政府“汲取能力差”的例证并不多，即使是一九九三年前后“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的几年，也只是受八十年代邓小平“放权让利”改革的影响，以及分税制前较为倾斜于地方的财政体制所决定的，并不标志着政府整体性的汲取能力多么低下。分税制体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财政集中度迅速上升，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因大块财政收入上移而支出责任不断“下移”（“事权下移”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的新格局下，尽管出现较大“赤字”，仍然可以很快找到土地财政等途径，持续性地筹集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我们从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上述判断的证据。

近十几年来，政府财政收入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两倍的速度一路增长，有些年甚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三倍。疯长的财政收入推动着财政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和政府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超大的政府吞噬财富胃口变得越来越大，有社会“供养不起”之虞。一九九五到二〇〇七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 5.7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 1.6 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 1.2 倍。韦森指出，政府财政收入如此超高速地增长的后果是，凭借强大的财政力量，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就越来越强悍。一个强势政府主导一切、统御一切的独特体制和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步成型。这样的体制，“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

韦森的话语重心长，与其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忧虑。“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加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制的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且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显然，在这样的“模式”下，任何经济或社会体制转型的努力都很难获得成功，而且阻碍我们国家转型的屏障，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它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正如韦森所指出的，我们有必要强调以下的判断：所有偏废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迟早会陷入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和普遍的腐败困境。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不禁让人担心，万一这次社会整体性“转弯”仍不成功，我们的社会将付出比以往转型失败更加惨重的代价，一百年前发生过的情景，难说不会再重新上演一遍。

那么，怎样做才能避免误入历史怪圈呢？韦森认为，需要“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和良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使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一个安全感，使企业家都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已经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历史之要求所刻不容缓的了”。他指出，宪政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守法，而不只是个公民守法的问题。“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我的知识能力，所谓宪政，就是当行政体系中有一种权力存在的时候，必须同时有另一种权力能够制约住它。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制约和监督，包括对监督者进行监督的权力。社会中不能存有绝对的、可以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不论这个权力来自何方和归何人掌握。各级政府内的所有行政和技术官员，其手中掌控的权力都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只有宪政的制度之索才能约束住权力，也只有经历宪政民主的洗礼，才能使当权者和社会公众都懂得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和遵守什么样的法律。

在所有的政府权力中，最难处理的是治税权的归属问题，如十二世纪初英国约翰王与贵族代表签订《自由大宪章》，“国王的钱袋子”易手于他人，才是影响制度变革的关键因素。政府征税权力的蔓延，必然与私人领域的财产权利直接接触，征税与纳税双方缺乏协商和讨价还价，就很难制定出尊重

私人产权的税率来。在缺乏外部政治控制的公共预算体制下，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会被更多地用于培植公共权力本身（如增大官僚体制的消耗性支出）而非保护私人产权。所以，一个市场国家在设置它的规则时，首先要在税收和预算问题上着力，用立宪的方式，给政府征税和安排预算的权力预设法律边界。布坎南指出，只要不是全体一致同意，群体不得以任何赞同比例剥夺任何公民的私人财产。政府之手必须保持干净，保持利益中性，并诉诸“知情权”来接受公民的审查。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权力制衡和相互监督机制、新闻与言论表达自由和与此相适配的面向全体纳税人的财政信息披露制度，这三大原理构成了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也是一个社会成功转型的大目标。如韦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好友汪丁丁先生指出的，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经常错置语境，以为我们的政府天生就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而热衷于建议开征那些只有在强力约束下才可以开征的税种和才可以开支的项目，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市场自上古时代即已存在，所谓“神农日中为市”是也，但市场的发展并不必然造就现代国家。现代国家转型也许并不只是蒸汽机等技术工具的变迁，也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产物，还应考察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而这恰是以往研究未予充分注意的问题。比如，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较多强调产权制度的作用而缺少对公共财政因素的分析。韦森也是制度经济学家，他看历史和现实理论问题的角度就与众不同，更重视制度变迁和国家建构中公共财政的作用。他主张限制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只有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权受到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和行使，只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纳税人来说透明了，并受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实际审议和约束了，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在现代社会，预算是联结政府与人民的纽带，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政府的工具。如市场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可带来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一样，纳税人也可通过财政公开、问责和纠错等机制与政府讨价还价，以获得公共经济成本的下降和公共品效用的提高，所以韦森非常重视现代预算制度的构建：“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没有预算民主，法治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没有民主预算，中国经济从长期来说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成熟的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成员通过寻求帕累托改进改变自己的福利状态，逐渐摆脱贫困和弱势的处境。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宏观经济学中最着力的领域。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人们对市场的预期也并不完全理性，一些未预期到的冲击有可能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完备，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普遍存在着价格如工资的“粘性”，并由此导致市场的失灵。于是，市场便不能完全保证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如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所指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用以影响产出、价格和就业等实际变量，便是有意义的。但是，政府干预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适当的限度，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在政府干预之下，个人选择的自由和空间不能因之而缩小。我理解，韦

森所推崇的“现代人类社会良序运行的基本法则”，就是建基于个体自由的，包括企业创业、创新的自由。这是一种宪政理念：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凡是个体能做的事情，社会就不要做；凡社会能做的事情，地方政府就不要做；凡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中央政府就不要做。只有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的環境中，人的心智才能健康地舒展，知识和智慧才能得到积累，创造性才得以开发，社会才能实现向文明方向的进步。目前我国经济中仍保留着较多的垄断因素和领域，政府干预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迹象，即所谓“国进民退”，其结果，必然是抑制创新创业，阻碍经济增长。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包容，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才能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政治权力都不能随意干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可保证人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强制和命令；自由市场还有把权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容易将其“解构”，而防止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人间兴风作浪。

韦森毕竟是一位经济学家，除了制度演进路径和路径依赖之类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在金融货币理论和政策方面亦有精深的造诣和独到见解。他指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他曾对我说，他要阐释的核心观点是，货币不完全是由央行发出来的，而主要是由贷款创造存款所“内生出来”的。初听不知所云，我的经济学功底跟他相比何止云泥之别？不过通读他的《大转型》第三篇《货币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算是补了一回课。韦森写到，在货币电子化和“数字化”（不仅仅是“数量化”）的时代，金融与货币体系不但技术上和形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运作机制也发生很大变化，表现在通货膨胀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已然“分道扬镳”。二〇〇八年下半年到二〇〇九年，中国经济体内增加了二十多万亿 M2，却并没有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这个现象用传统方法很难解释，也没有引起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韦森说，分歧是存在的，包括与他的好友周其仁教授。经济学家忽略的另一个现象是，现代网络技术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作为 M1 的存款和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资产投资组合之间进行自我操作，这使得作为“流动性”的货币存量与金融资产投资之间变得非常便捷，它改变着金融体系的运作，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韦森认为，若想解释这两种新的经济现象，只能在现代经济学的内生货币(endogenous-money) 理论中寻找工具。按照这一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观点，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在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中，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而导致物价上涨，而是资本资产头寸的增加，以及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加，导致广义货币在经济体内部“内生地”创生出来。韦森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中国情形，指出，二〇一〇年货币政策摇摆不定，银行信贷再度失控，全年银行贷款规模在二〇〇九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7.95 万亿元，加上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快速增加，导致全年 M1 和 M2 分别增加了 21.19%和 19.72%，总额达到 72.58 万亿元。于是，近七十三万亿的广义货币就这样被人们“创生”出来了，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把魔鬼从一个瓶子里释放出来。这个“数字魔鬼”入世的结果可能是：若紧缩银根，物价上涨的势头就很难抑制；

若贷款，各银行又特缺钱，因为大部分储蓄已经被贷了出去。故而央行一提高法定准备金，各银行就纷纷告急，一些在建项目就会随之缺血断氧。这就决定了决策层只能在货币政策上玩走钢丝，弄不好，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上去了，经济增速却滑下来这种最坏的结果，即宏观经济学所说的“滞胀”（stagflation）。韦森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罗斯巴德（M.N.Rothbard）的话：美国大萧条只不过是之前政府在干预下不负责任的“扭曲和不当投资”的一种清算。他说，罗斯巴德三十年前的警示很值得今天的我们细细品味。

社会转型不是一件容易事，它要求社会各界对转型的价值取向达成基本共识，利益各方学会协商妥协，认可每一方都难以取得完全胜利，每一方也都不可以完全失败，在必要的时候，某一方还不得不放弃自己利益的一部分，才能达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它也要求谨慎处理好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不可偏废一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受惠，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所以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和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转型也是对一个民族的智慧、见识、胸怀的考验。那些转型成功的国家和民族，必是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和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它们因而有了光明的现在和未来。经济学家应多多致力于推进宪政民主建设，将捍卫市场经济视作自己的天职。

百年转型，百年未成，败亦凛然悲壮，也使我们明白了以下道理：人类社会，善与恶、文明进步与野蛮倒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价值观总是并存的，有时候，善和文明进步并不强于恶和野蛮。但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愈加明白的道理是，人类总体上是向着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方向演进的，而不是相反。构成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基本原理、运行法则和基本理念，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和普世的。正如韦森在《大转型》中引用康德所说的：“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任何国家或民族，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国情”、“特色”，都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于人类文明演进的这个“大转型”。

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定是在这个方向上。韦森引《周书·泰誓》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诗经·大雅》中则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语，是说天道如此，我们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进发，披荆斩棘，而不是背道而行。 🍷

[【返回目录】](#)

## 周南焱：专家谈中国科幻电影：编剧、导演心有余而力不足

[周南焱 北京日报记者。本文首发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北京日报。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好莱坞太空科幻片《地心引力》最近在国内热映，赢得一片叫好声，目前票房也已达到 2.7 亿元，市场势头依然强劲。《地心引力》令人震撼之余，也让人发现，中国电影今年数量虽多，却看不到一部科幻片，这块市场全部被好莱坞占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在科幻类型片领域却为何集体缺位？



2013 年上映的好莱坞太空灾难科幻片《地心引力》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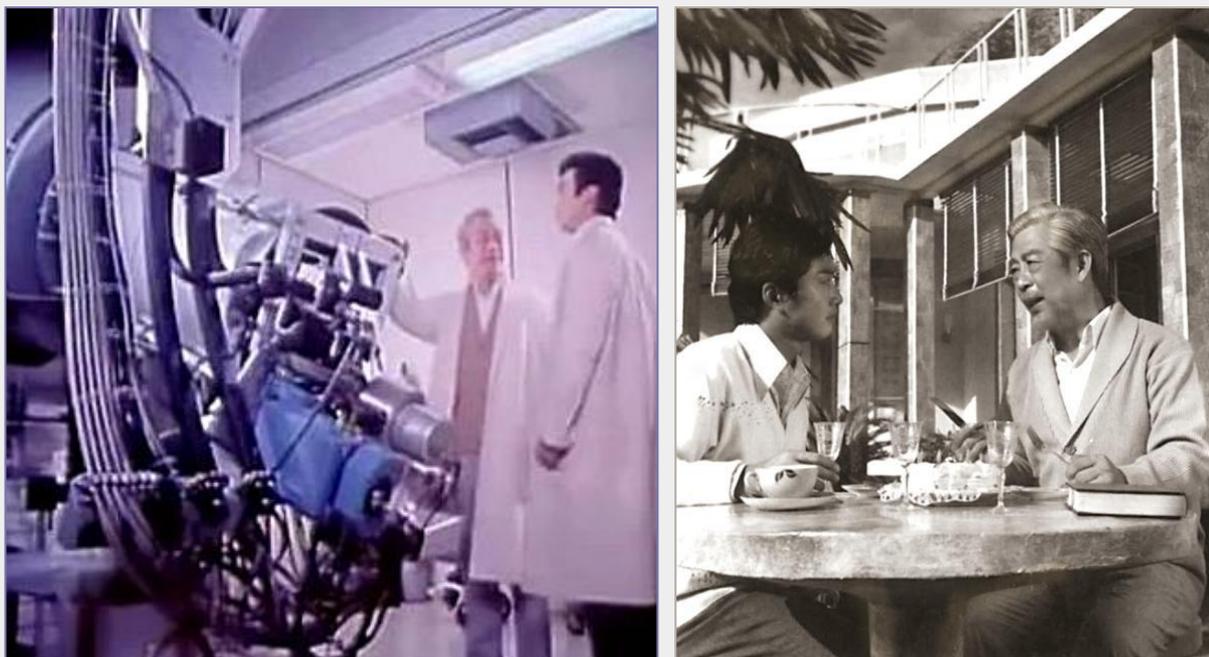
### 人才 懂科幻的不懂电影，懂电影的不懂科幻

好莱坞早有拍科幻片的传统，如上世纪 60 年代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 太空漫游》就达到了经典的高度。同为太空题材的《地心引力》探索了人面对宇宙的孤独与恐惧，把科幻片的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在科幻作家韩松看来，好莱坞导演对科学技术的熟知和敏感令人感叹，但中国人现在还拍不出《地心引力》，因为没有那种思维和感悟。

国内电影圈里，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科幻片只不过是现代版《封神演义》。“科幻片不是魔法式的电影，要有科学原理、时代感觉和艺术想象。”著名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说，自己跟国内导演聊天，发现他们大多不懂科幻片。

“懂科幻的不懂电影，懂电影的不懂科幻。”制片人关雅荻说，中国编剧和导演理科知识相对贫乏，对科幻题材心有余而力不足。《阿凡达》导演卡梅隆在大学时是物理系高材生，而中国导演大多是艺术学院出来的，想要创作充满科学术语的“硬科幻故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想象力，近年还出版了很多科幻作品。“像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影响就比较大，也带动了更多年轻人愿意写作科幻小说。”吴岩介绍，类似《地心引力》这样简单的故事，或者像《三体》这样复杂的故事，国内的科幻小说越来越多，具备改编成电影的题材基础。他透露，现在跟科幻作家谈改编版权的影视公司很多，但由于缺乏懂科幻的电影人，拍摄成功的几乎没有。



1980年公映的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由张鸿眉执导的，乔奇、凌之浩、乔榛等出演

### 技术 设备不难引进，难的是没人会用

中国也并非没有科幻片，上世纪80年代，先后拍出过《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等科幻片。尤其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以47万元成本拍出的《霹雳贝贝》，当年公映时影院里的孩子们叫声一片，几乎站着看完整部影片。不过，吴岩坦陈，跟好莱坞科幻片相比，那时候拍科幻片使用的技术手段显得太过简陋了。

之后二十多年，国内仅有《长江七号》《未来警察》等影片勉强可归入科幻电影，但这两部影片都没能获得成功，票房惨淡。科幻片投资成本大、风险高，让业界不敢再趟浑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幻片是很高端的类型片，对电脑特技、资金的要求很高，必须具有电影工业实力才能做。“中国电影人擅长武侠动作片，但电脑特技不行，产业上也不成熟。”他举例，好莱坞科幻片《黑客帝国》有对宇宙以及高科技很深邃的前沿思考，但国内电影人没有这种积淀。而《地心引力》在摄影棚里模拟男女主角太空失重的场景，又用电脑特效制作出人物

所处的宇宙背景，中国电影工业目前尚不具备这种高新技术能力。



1999 年好莱坞科幻电影《黑客帝国》剧照，电影导演兼编剧是沃卓斯基跨性别姐妹，也是原著作者，《黑客帝国》已拍摄三部，被誉为科幻电影的经典作品

好莱坞技术设备并不难引进，但国内没有几个电影人会使用。科幻小说《三体》今年已在电影主管部门立项，小说的故事格局很宏大，改编的资金、技术要求很高。关雅荻预测，以目前国内影视公司的技术水准，什么时候拍出来还是个问号。“如果技术不行，科幻片拍出来的画面不逼真，很容易让人倒胃口。”在影评人韩浩月看来，国产科幻片目前想模仿《地心引力》是不现实的，拍出来只会是山寨货。

### 出路 利用好莱坞团队，“借船出海”

科幻片是好莱坞在全球攻城略地的利器，中国电影不能跟好莱坞拼技术，但仍然可以拍科幻片。“可以先借科幻片的皮囊，拍有意思的感人故事，不一定非要有大场面，不一定非要有外星人、外太空。”韩浩月认为，可以借用科幻手段来表现人物的生活情感。在技术要求上别太高，用尽量少的成本拍出好的科幻故事。

“《三体》其实可以‘借船出海’，利用好莱坞的技术、创作团队来做。”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主张，盲目做科幻片不太实际，但只要资金允许，不妨与国外团队合作。这一点也得到业内人士的赞同。如今，中国电影市场崛起，好莱坞技术团队纷纷来华淘金，国内影视公司正好可以抓住机会，利用他们先进的电影拍摄、制作技术，来讲好本土化的科幻故事。

为了国产科幻片的发展，业内呼吁应该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并在科幻题材的审批上更宽松一点。关雅荻说，自己曾买下刘慈欣科幻小说《球状闪电》的改编权，压手里好几年也没做成，因为题材

涉及军事工业，立项审查无法通过。“科幻片难免有超现实的内容，有一些夸张的情节。”吴岩也说，自己身边朋友最近拿一些科幻剧本去立项，发现很难过审，这也限制了科幻片的发展。

对国产科幻片的未来，吴岩一方面有些悲观，全世界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很少能拍出像样的科幻片；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很乐观，毕竟 80 后和 90 后已经成长起来，这代年轻人拥有新的科幻思维和知识储备，未来有可能拍出科幻片。关雅荻则认为，短期内国内科幻片不会有多大进展，只有电影产业这块蛋糕越来越大，吸引不同行业的人才进来，才可能制作出本土科幻大片。 🍷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3万元（2019-2020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9-2020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